

十三、四世紀德意志騎士團的東北歐十字軍 在中古異教徒戰爭中的地位*

杜子信**

摘要

十三至十四世紀德意志騎士團在東北歐的普魯士及立陶宛所進行的異教徒戰爭，係屬中世紀高峰期所興起的十字軍運動之一環。最初在 1190 年成立於巴勒斯坦的德意志騎士團，在東地中海的十字軍國度日趨衰敗的背景下，使其在該地的發展並不順遂。時至十三世紀前期，適逢波蘭北部馬佐維亞公國在波羅的海南岸的異教徒戰爭一再失利，德意志騎士團於是藉由受邀而將其發展重心轉向東北歐。至十三世紀晚期之際，德意志騎士團對異教徒普魯士人所進行的宗教戰爭，可謂是一重振十字軍理想之機。係因羅馬教宗及各地諸侯欲藉東北歐信仰戰爭，重新激勵基督教世界的整體士氣，騎士團也就藉各方之助而在 1283 年全面征服普魯士。其後當基督徒在 1291 年失去巴勒斯坦最後一個據點後，對異教徒復仇情緒頓時轉向對立陶宛人的戰爭中。其後整個十四世紀進程中，德意志騎士團的立陶宛戰爭，薈集全歐貴族武士的目光，紛紛展開所謂「普魯士之旅」或「立陶宛之旅」，加入征討立陶宛人的聖戰。本文擬以德意志騎士團的東北歐十字軍為題，探討此一異教徒戰爭的本質及其在中古異教徒戰爭中的地位。

關鍵詞：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異教徒戰爭、北方十字軍、普魯士、立陶宛

* 誠摯感謝兩位審查委員對本論文的肯定，以及針對內文所給予的各項增補及刪修的建議，謹此致上最深之謝忱。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The Crusades of the Teutonic Order in Northeast Europe in the War against Pagan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Tu, Tzu-hsin*

Abstract

The Crusade campaigned by the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 in Prussia and Livonia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was part of the Crusade movements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The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Palestine in 1190, but the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 did not develop without obstacles. By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when the Mazovia Duchy in northern Poland's war against the pagans failed, the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reinforce the Mazovia Duchy in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pagans in Northeast Europe. This helped the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 to revitalize and to conquer Prussia in 1283. As Acre in Palestine fell in 1291, the war against pagans was turned to the Lithuanian in Northeast Europe. In the 14th century,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pagans attracted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knights from all over Europe to join i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rusades taken by the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 in Northeast Europe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and it will analyze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this religious war in which the nobles and the knights were drawn to participate in terms of Holy War against the Lithuanian pagans.

Keywords: The State of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 Pagan War, Nordic Crusades, Prussia, Lithuania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壹、前言

十三世紀前期，西方羅馬教會的傳教士就其時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的波羅的海地區的武力傳教行動中，於文獻上留下了如后一段的記載：

於是異教徒（立陶宛人）在基督徒（十字軍）的打擊下而潰散敗逃，有些逃入森林之中，另一批則沿街奔亡，大批牲畜則棄之於野。基督徒隨即毫不留情地鎮日追擊並大舉屠戮之，最後僅有少許異教徒僥倖逃離。隨後基督徒重回村莊檢視其戰利品，旋即釋放已皈依的婦女、孩童及先前被俘的德意志基督徒。所有新近皈依的立夫人及拉脫人，現都與德意志人歸屬於同一陣營，一同感謝上帝的慈愛恩典，並進而得以取回先前被狼群（此指立陶宛人）所噬咬而一度失去的羊群，所有基督徒共享戰利品，從而感受到基督徒兄弟般的友愛情誼。……異教徒總在絕望之餘呼喊著和平，但在他們若真心想要得到和平，他們就必須領受真正和平使者的意旨，也就是皈依耶穌基督並正式受洗。¹

此段文句出自一名源出北德的傳教士亨利希·馮·拉脫蘭（Heinrich von Lettland, 1187-1259）的著作《立夫尼亞編年紀》（*Chronicon Livoniae*），該文獻詳實記載著佩劍兄弟騎士團（Der Schwertbrüderorden/The Order of the Brethren of the Sword）在征服並武力傳教於立夫蘭／立夫尼亞（Livland/Livonia）時，以暴力殺害並迫令異教徒皈依的歷程，從中清楚揭櫫了中古歐洲基督教會及所屬武裝修會對於異教社會所持的基本態度：受洗或受死（Taufe oder Tod/baptism or death）。其後在 1237 年隨著佩劍兄弟騎士團全部併入德意志騎士團後，德意志騎士團（Der Deutsche Ritterorden/The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亦以相同的武力傳教手段，在全面征服立夫尼亞與普魯士（Preussen/Prussia），以及揮軍征戰立陶宛（Litauen/Lithuanian）的歷程中，強行施加予波羅的海異教徒之身。

事實上，類似的場景在中古歐洲的邊陲地帶諸如亞平寧半島南端及西西里島、伊比利半島，以及東地中海及巴勒斯坦地區，皆先後上演著。這項由當時西方羅馬

¹ Heinrich von Lettland, *Chronicon Livonia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59), new translation of Albert Bauer, pp. 76-77.

教會所號召並發動的所謂「聖戰」(Heiliger Krieg/Holy War)的「十字軍」(Kreuzzug/Crusade)行動，實為歐洲在歷經了中古初期的混沌沉潛，至十一世紀中期以降，以一股政經社文及信仰上全面蓬勃爆發的生命力，進而向歐洲邊陲地帶釋放這股強大的動能，致而造就了中古歐洲全面性的向外擴張及疆域開發的紀元，並進而決定性的形塑出今日歐洲疆域的大致雛形。

基於中古高峰期西方羅馬教會對於戰爭態度的轉變，以及亟欲建構並鞏固其於基督教世界的信仰道德、乃至於世俗領導的至尊無上地位，除了廣為號召各封建領主籌組十字軍之外，結合著修院教規及世俗佈道於一體、並在名義上隸屬羅馬教會的「武裝修會」(Ritterorden/Order of Knight)：聖殿騎士團(L'ordre du Temple/Order of Solomon's Temple)、醫院騎士團(又稱聖約翰騎士團 L'ordre des Hospitaliers/Order of Hospitallers or Order of Saint John)、德意志騎士團，以及其他軍事修會組織等亦緣時而生，並盡皆以上帝為名而分別展現其炙熱虔誠的宗教情操，以及政治野心於歐陸邊陲地帶的各大戰場上。

德意志騎士團的東北歐十字軍行動，本質上無異於其他武裝修會在前述所提各地對穆斯林的武力征戰之舉，然而發跡時間較晚的東北歐十字軍行動，在整個十字軍運動的時代中仍有其特殊意涵，係因在十三世紀前期，當各地十字軍戰果每況愈下及停滯不前、致使十字軍運動的理想及熱情漸次消沉黯淡之際，藉由德意志騎士團對異教徒的普魯深人及立陶宛人的暴力傳教，以及武力征服行動，適時承載了羅馬教廷的聖戰大業及十字軍理想，從而維繫了羅馬教會在精神及世俗世界上的高度威望，與之同時，一個廣袤遼闊的波羅的海強權，德意志騎士團國家(Der Deutschordensstaat/The State of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亦正式建立於東北歐地區。²

本文擬以十三至十四世紀德意志騎士團的波羅的海異教徒戰爭為題，探討此一時期該團對普魯深人及立陶宛人的軍事征伐及武力傳教行動，藉之闡明何以此兩世紀的異教徒戰爭，對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具有極端重要性之所由。此外這兩場異教徒戰爭，對當時全歐封建社會又扮演著何種功能？何以其會吸引大批貴族武士絡繹

² 有關中古高峰期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在普魯士及立夫尼亞的肇建及興衰始末，以及該史實對近現代歐洲學政界所造成的諸多爭議問題，請對照如后專文的說明：杜子信，〈近代德波敵對下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史的政治工具化〉，《成大歷史學報》，第56號(2019)，頁133-199。

不絕地前往參戰？亦藉由上述課題，兼論歐洲十三至十四世紀的異教徒戰爭的本質及十字軍運動的演變。行文之初，則有必要先行簡要申論十字軍運動在歐洲出現的緣由，俾進而了解隸屬其一環的東北歐十字軍肇興之所由。另就本文的參考文獻及運用資料而言，擬以第一手拉丁文及德文史料為本而析論之，次則輔以各類德文及英文專著而強化之。至於全文論述範圍則以十二至十四世紀之間為期而進行探討。

貳、十字軍運動思想的浮現及其紀元的產生

十字軍行動是歐洲中世紀高峰期（Hochmittelalter/High Middle Ages）的產物，其產生之因並非偶然，實與該時期全歐遽然爆發的旺盛原動力息息相關。由於從十一世紀下半期開始，全歐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宗教等所有面向都呈現蓬勃興旺的發展，歐陸各地社會普遍浮現樂觀昂揚之態，緣自各階層民眾普遍認定，逐步臻至小康富足的世俗世界，係上帝賜予其子民之福祉，乃因而亟欲將對耶穌基督的炙熱虔誠，透過所有面向而展現其榮耀天主的心願，因而向異教徒及伊斯蘭世界展開傳教佈道、乃至於軍事擴張行動，強令其接受基督教義，就成為其宣揚天國之福音的最實際具體的作為。³

中古高峰期之名，得之於進入十一世紀後半葉以後全歐逐步湧現的旺盛生機而來，此種蓬勃昂揚的生命力，實為其後延續數百年之久的歐洲十字軍運動肇興的原動力之所在，本文在深入析論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東北歐十字軍運動之先，尤須略為回溯至十一世紀中葉前後全歐在各領域的蛻變經過，始能明瞭十字軍運動肇興的根源。

促使中古歐洲全面性甦醒及活動力遽增的第一項因子，首先來自於農業技術革新後所帶來的人口增長。進入十一世紀之後，由於歐陸四鄰外患的侵擾大幅減少及基督教信仰的逐步傳播，歐陸西部的發展漸趨穩定，致使生產力得以逐步提升。此一時期，由於天然動力如風車水車的大量運用，大量沼澤溼地因而被排乾，與之同時大片原始森林遭砍伐後所產生的廣闊新生地，在各項農耕技術包括長柄鐮刀的運

³ Robert Bartlett, *Die Geburt Europas aus dem Geist der Gewalt* (München: Kindler, 1996), pp. 10-13.

用、馬匹取代牛隻而成耕種主力，以及三耕制取代二耕制等的投入之下，單位農產量於是大增。⁴ 於是在這項所謂「第一次農業革命」的紀元之下，自然而然地導致西北歐人口數量從十一世紀中葉至十四世紀中期的大量增長，⁵據統計，在 1000 年之時，西北歐各地包括德意志、法蘭西、不列顛群島及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人口數量，約在一千兩百萬左右，然而時至 1325 年時，上述地區的人口總數已然突破三千五百五十萬之譜。此種人口過剩的壓力下，人群必然尋求續命生機的可能性，因此拋棄過度擁擠的原鄉而前往外地發展，成為被迫且是不得不然之舉。⁶ 歐陸西半部的人口過剩壓力，對於爾後歐洲向週遭邊緣地帶的疆域擴張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源。⁷ 其後隨著初期奪回聖地及疆域拓殖行動的成功，許多參與者取得大批土地及財富的訊息逐步傳開之後，更對於在原鄉發展受困的人們而言，無疑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因而遂有大批源自歐陸西北部各階層人士參與歐洲邊陲地帶的冒險行動，其動機毫無疑問地是覬覦著異教世界的廣大財富及土地而來。

其次就經濟方面而言，隨著十一世紀中期以來中西歐各地的社會穩定及農產量的急劇增長，商業貿易活動亦在此際大舉蓬勃繁興。從最初的市集販售交易，逐步發展為區域商貿活動，最後並進而衍生至遠程貿易，透過陸路、河道及海運等交通途徑，使得商貿形式由短程延伸至遠方區域，進而促進了一系列新興城市群在全歐各地的出現，促使了中西歐的財富迅速累積，成為日後向外擴張拓殖時的雄厚資本。⁸ 與之同時，野心勃勃的城市商業集團或城市同盟組織，為了尋求更大的經濟利益，甚且不斷地將其經商貿易範圍擴及當時歐洲邊陲地帶，諸如義大利諸城邦共和國威尼斯、熱內亞及比薩的經略東地中海域：利凡特（Levante）地區，以及以中北德城市為主力的漢薩組織（Hanse）前進波羅的海及北海海域等等，從而也使之成就歐洲邊陲地帶疆域開發的重要推動力之一。⁹

⁴ Hartmut Boockmann,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1), pp. 53-54.

⁵ Michael Mitterauer, *Warum Europa? Mittelalterliche Grundlagen eines Sonderwegs*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9), pp. 24-26.

⁶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9), p. 116.

⁷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 368.

⁸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pp. 368-370.

⁹ Hartmut Boockmann, *Wege ins Mittelalter*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0), pp. 55-64.

再就信仰及藝文發展而論，此一時期的歐洲人在經濟發展興旺及社會步向小康境界之期，對於上帝賜福滿懷感恩孺慕之心，致而使得基督教信仰的宗教熱情在此際一舉爆發，此種虔誠甚至趨近狂熱的宗教情緒，首先見之於教堂內部的聖壇擺置及外部的建築變化上。十一世紀後期時，原本沉穩端坐於聖壇之上且神聖不可碰觸的耶穌基督像，在此際一轉而被以釘上十字架上的鮮明受難形象而出現，這種刻意營造出上帝為其鍾愛子民的犧牲受難形象，彰顯出時人滿懷著救贖的心境而欲向上帝懺悔並獻上炙熱崇敬的心理。¹⁰

這股對上帝之愛，同時亦可由上帝之家：教堂外觀上的變化一窺端倪。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間，歐洲各地紛紛興起了一種新型的建築式樣：「哥德式建築」（Gotik/Gothic）。此種發端於「羅馬式」（Romanik/Romanesque）建築之後、並流行於中古高峰期末至晚期的建築型式，其最大特色在於有著許多伸向無際蒼穹天際的塔尖、輕盈削薄的外牆、以及許多承載並分擔建築體重量的尖拱形高窗，從而彰顯建築師的構工理念：強調建物與地面的垂直線效果遠重於深植於地面上的安定感。當時的建築師為了盡其可能地強化垂直線的效果，因而揚棄了先前羅馬式建築以厚重石塊作基底的設計工法，轉而採取大量筋骨穹窿、尖拱形高窗、飛簷及扶壁等技術，使得建築體出現大量的銳角組合，從而建構出輕盈靈巧的特徵與向上推升的力道，外觀極為華麗壯觀。哥德式建築的出現，再一次印證，中古高峰期全歐世俗生活的步入小康安定的境界，社會各階層基於虔誠的宗教信仰，致而透過對「上帝之家」的精心雕琢而表達其欲榮耀上帝的熱忱。¹¹ 此種炙熱的基督信仰熱情，使得任何以上帝為名的行動，皆會激發基督徒效死投入之神聖使命感，致而塑造出當時歐洲人對邊陲地區擴張及疆域拓殖的一股強大原動力。

此外中古封建社會結構的轉變，亦屬全歐全面向外發展之不可或缺的原動力之一。時至十一至十二世紀之交前後，封建社會在中西歐各地的發展已漸趨穩固，封建貴族的長子繼承制原則，普遍獲得確立，因此封建社會各諸侯貴族的庶出子嗣在故居毫無遺產繼承權的狀況下，被迫只能前往陌生的異地尋求發展之機。¹² 於此同

¹⁰ Johannes Fried, *Das Mittelalt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8), pp. 180-181.

¹¹ Wilfried Koch, *Kleine Stilkunde der Baukunst* (München: Orbis Verlag, 1991), pp. 30-31.

¹² Ferdinand Seibt, "Die Deutsche Siedlung im Osten: Träger bürgerlicher Lebensart in Schlesien, Böhmen und Südosteuropa," in Hans-Ulrich Engel, ed., *Deutsche unterwegs: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Ostsiedlung bis zur*

時，原本封建社會形成過程中基於抵禦外敵入侵而產生的大批貴族武士階級，亦基於此一時期外患的漸次消弭，導致其對外作戰功能暫失的情形下，轉而對內進行彼此動武私鬥之舉，致使各國內部各區域一再陷入程度不一的騷動不安之中。羅馬教會為了遏阻貴族武士不斷私鬥情形的擴大，因而從十世紀末期開始，在南法各封建領地中推動所謂「上帝和平」（*Pax et treuga Dei/Peace and Truce of God*）的阻鬥政策，明文禁止在聖季及聖日、甚至是一週內的多數日子進行決鬥行動，違者將受教會法庭審判，¹³其後「上帝和平」行動至十一世紀末期後，逐步擴及至包括德意志在內的其餘歐陸各國之中。¹⁴ 然而「上帝和平」政策終究未能全面消弭若干武士好鬥的習性於無形，因此若能將此類性好逞兇鬥狠的貴族武士引到境外去對抗穆斯林或其他異教徒，一方面既能增加羅馬教廷威望，同時亦可使歐陸社會內部為之寧靜和平。¹⁵ 羅馬教會將封建貴族武士的好戰行徑轉移於歐洲邊陲地帶，不啻也提供了歐洲向外進行疆域擴張與拓殖時的一股蓬勃興旺的戰鬥力。

所有在中古高峰期各領域所呈現的即將決堤破口的澎湃擴張動能，則在羅馬教會的一連串革新行動中，形成了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洪流而盡數向外傾瀉而出，此處所指涉者，係羅馬教會的改革運動及教宗統治權力的高漲。源自教會有識之士為了改革神職人員的步向腐化及自滿行為，在十一世紀之時興起了改革本篤修院的聲浪，於是在 1059 年羅馬教廷的宗教會議上，頒佈了一項重要的法規：「聖奧古斯丁教士法規」。鑒於先前本篤修院各分部院長因掌控大筆教產，時而不免淪為若干綱紀不修的敗德之士中飽私囊，因而這項法規明令今後各本篤修院院長必須與一般僧侶修士共同生活，同遵嚴苛簡樸的退隱修行，期藉該法規而消弭教會修院腐化之源於無形。¹⁶ 此一基層教會組織的改革，重振了修院綱紀，並適時迎合了平信徒因宗教情操爆發下對教會組織的仰望與崇敬，與之俱來者，厥為各類新型改革修會諸如 1098 年的西多修會（*Ordre cistercien/Zisterzienser/Cistercians*）及 1120 年的普雷

Vertreibung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Günter Olzog Verlag, 1983), p. 50.

¹³ Michael Mitterauer, *Warum Europa? Mittelalterliche Grundlagen eines Sonderwegs*, p. 215.

¹⁴ Hanna Vollrath, "Deutsche Geschichte im Mittelalter," in Martin Vogt, e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und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1990), p. 75.

¹⁵ Roland H. Baint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A Historical Survey and Critical Re-evaluation*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79), pp. 111-112.

¹⁶ Gert von Pistohlkors,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Baltische Länder*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Verlag, 1994), p. 31.

蒙特萊修會（Prémontré/Prämonstratenser/Premonstratensians）的建立，同時亦觸發了結合修院苦修及武力傳教的軍事修會的出現，諸如聖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及德意志騎士團等等。此類新型改革修會及軍事修會或誓願於渺無人煙的蠻荒地帶，厲行嚴苛簡樸的出世修道生活、¹⁷或結合嚴苛的修道戒律與軍事生活於一身，進而向外拓展基督教世界的政治領域，兩者皆成為中古高峰期的疆域開發與拓殖行動中的一股重大力量。¹⁸

至於羅馬教廷的改革所導致的教宗威望高漲及教宗統治制度的建立，則為中古高峰期擴張動能引爆的關鍵推手。由於宗教情操的炙熱昂揚，使得中古初期時普遍存在的各國世俗政要控制各國教會機構的情形，在此際受到強烈的挑戰，羅馬教會的激進改革之士決心要扭轉世俗掌控教會的現況，轉而建立起一個厲行教義清規且以之來改造世俗社會的教宗統治體制。此種理念下，包括教士操守、教士獨身、神職買賣，教宗的產生，尤其是世俗君主控制神職任命權，皆成為改革之士關注的焦點。其後羅馬教廷在歷經了一系列與世俗君主的慘烈鬥爭之後，成功地建立起樞機主教團直選教宗，以及取得了對中西歐各國境內絕大部分教會事務的控制，從而建構起教宗統治體制。¹⁹羅馬教宗及羅馬教會既在精神世界取得至高無上性，以及在世俗世界中隱然有力壓歐洲各國君主的地位，當然欲將其改造世俗社會的雄心透過其威望而展現。此種背景下，藉由發動十字軍行動及號召廣大基督徒對該行動的狂熱支持，將可一舉確立羅馬教宗及羅馬教會在基督教世界之中無可挑戰的地位。與之同時，隨著大批十字軍軍隊的應教宗之喚而為之效勞，亦可憑藉這股駭人聲勢而力壓當時東方的拜占庭皇帝及希臘教會，令其臣服於羅馬教宗及羅馬教會的領導之下，一舉弭平長期以來的東西教會分裂之局。²⁰

¹⁷ Bernhart Jähni,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Münster: Nicolaus-Copernicus-Verlag, 2011), pp. 1-3.

¹⁸ Johannes Fried, *Das Mittelalt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pp. 183-185; Gert von Pistohlkors,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Baltische Länder*, p. 31.

¹⁹ Johannes Fried, *Das Mittelalt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pp. 171-174.

²⁰ 基督教從創立之初，由初期的橫遭羅馬當局的打壓至四世紀初時取得羅馬帝國國教的地位之時，因耶穌的使徒彼得及保羅皆殉教於羅馬，使得羅馬大主教區的地位向來高於其他各城大主教區之上而擁有首席權地位，此即所謂「彼得磐石說」(Petrine Theory)。然而到了451年基督教第四次普世大公會議：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上，通過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提升至與羅馬教宗並列的首席地位，引發羅馬教宗的強烈不滿，遂埋下了兩者不合的根源。其後又經歷了七世紀拜占庭帝國「圖像存毀之爭」(Iconoclasm)時，教宗強烈撻伐拜占庭當局的破壞聖像行動，以及其後拜占庭皇帝逮捕教宗並予其羞辱，使兩者間關係迅速惡化。時至752年，羅馬教宗在西方的法蘭克王國尋得強大世俗力量的襄助後，羅馬教宗與拜占庭牧

由教宗及羅馬教會權勢的迅速高漲及欲全力打造並主導基督教社會的建立中，同時亦可觀察出羅馬教會對戰爭態度的明確轉變。長期以來，教會在神愛世人及講求博愛寬恕的理念下，對於基督徒執戟持戈投身作戰行動向持反對立場，即使是防禦行動、甚至是涉及於傳播基督教大業亦然。先前教會導師聖·奧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ensis/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雖曾一再告誡，基督教世界之世俗君主的義務在於，必須致力於銷毀異教徒所膜拜的偶像，並竭盡所能地使異教徒皈依基督教，然其過程則應使其發自內心自願地仰望領受天恩，斷不宜採行強制手段。然而從十一世紀後半葉開始，隨著基督徒宗教熱情的爆發及羅馬教會聲望的高漲，教會對戰爭的態度出現了鮮明的轉變。此際教會以其立基於精神世界主導者的地位，轉而將原本聖·奧古斯丁的訓喻作出輕重有別的解讀，刻意強調前半部的基督教君主銷毀偶像的義務，於此同時則蓄意忽略後半部的應使異教徒自願皈依的指示。²¹

此一轉變不啻清楚說明了羅馬教會對於傳播基督教大業的態度：在非常時期應採行非常手段，認為如果戰爭是基於道德信仰上的前題，則是完全被允准的，甚至是應熱情以對的，係因這場戰爭是基督徒在穆斯林及其他異教徒的威逼之下，被迫進行的一場自我防衛戰爭。因而在此種情形下，對穆斯林及其他異教徒進行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就被視為是榮耀上帝及為上帝效勞之舉。於是羅馬教會乃憑藉其佇立於西方世界的道德及精神的領導地位，在其積極推動及宣傳之下，基督教世界中就發展出所謂的神聖信仰戰爭，宣稱此舉是「上帝之所願」(Gott will es/God wills it)，此即「聖戰」，認為對穆斯林及其他異教徒進行一場以上帝為名的戰爭，實為實現「世界正當秩序」的必要手段。²²

既然羅馬教會認為戰爭是榮耀上帝之舉，當然就順勢引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這股炙熱宗教情操，使之為其建立基督教社會的終極目標而效勞，因此 1095 年之時，羅馬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 1035-，教宗 1088-1099) 於法境克雷蒙(Clermont)

首間的裂隙愈見擴大，其後再經 863 年涉及雙方針對「聖靈由聖父出」或「聖靈由聖父及子出」的所謂「佛西亞分裂」(Photian Schism) 後，羅馬教宗與拜占庭牧首已成水火。最後終在 1054 年因君士坦丁堡牧首指控羅馬教宗擅改聖經內容及教義，以及聖餐禮無酵餅乃源自猶太教異端等爭議，羅馬教宗則回敬對拜占庭教會擁有最高統轄權之後，導致雙方互將對方宣佈破門除籍，造成「大分裂」(Great Schism)，是為基督教會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形成了西方的羅馬公教及東方的希臘正教，簡稱為西方教會及東方教會。詳請參閱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pp. 203, 270, 328-332.

²¹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 109.

²² Georg Stadtmüller, *Geschichte Südosteuropas* (München and Wi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76), pp. 168-169.

登高一呼，宣稱十字軍行動乃上帝之所願，參與者將被赦免其罪行，死後將不會受到煉獄的折磨而直接升上天堂等等，²³致使歷時數百年之久的十字軍運動於焉產生。

參、東北歐十字軍運動的先聲：溫德十字軍

東北歐十字軍，亦稱「波羅的海十字軍」（Baltische Kreuzzüge/Baltic Crusades）或「北方十字軍」（Nordische Kreuzzüge/Nordic Crusades）運動，係屬歐洲中世紀高峰期廣大的十字軍運動之一環，這項行動原本相較於其時基督教世界所全面關注的奪回聖地耶路撒冷與東地中海地區的經略征服，以及伊比利半島上的基督徒「收復失土運動」（Reconquista）中，只能算是在歐洲邊陲地帶的一項較為次要的軍事行動，不過時至十三至十四世紀之時，卻逐步發展成為整體十字軍運動的焦點，此實與十字軍行動的興衰演變及東北歐異教徒戰爭的戰果斐然息息相關。

東北歐十字軍並非是單一的十字軍行動，實係由十二世紀中葉一直延伸至十五世紀初期的一系列北方十字軍行動的總稱，主要包括三波大規模的異教徒戰爭，分別是 1147 年的德意志北部、波蘭及北歐各地諸侯聯軍在德境易北河及奧德河間之地，對西斯拉夫部族溫德人所進行的「溫德十字軍」（Wendekreuzzug/Wendish Crusade）行動、1225 年至 1283 年的德意志騎士團及被其所合併的佩劍兄弟騎士團，在波羅的海南濱的普魯士及波羅的海東岸的立夫尼亞，對波羅的海部族普魯士人及隸屬於芬蘭——烏格里部族（Finno-Ugric）的立夫人、庫爾人及愛沙尼亞人所發動的信仰暨征服戰爭，以及十三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的德意志騎士團在東波羅的海地區，對另一支波羅的海部族立陶宛人所進行的宗教暨領土擴張行動。這項中古高峰期德意志十字軍在今德境易北河以東之地，以及德意志騎士團在普魯士及立夫尼亞的征服行動，在今日德意志及歐洲史學界的觀點中，係將之列入廣大的「中世紀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史」（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Deutschen Ostsiedlung/History of the medieval German eastern 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之一環。²⁴

²³ Georg Gresser, "Die Kreuzugsidee Papst Urbans II. im Spiegel der Synoden von Piacenza und Clermont," in Peter Bruns and Georg Gresser, eds., *Von Schisma zu den Kreuzzügen 1054-1204*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5), pp. 133-134.

²⁴ 德人在今德境東疆及東北歐的移民拓殖行動，截然有異於同時期德人在廣大中東歐其他地區所進行的

本文主旨聚焦於德意志騎士團在普魯士及立夫尼亞所進行的異教徒戰爭，然而基於東北歐基督教化歷程的類似本質及持續化進程，略為回顧溫德十字軍行動的始末，將有助於中世紀東北歐異教徒戰爭的全方位了解。

羅馬教會欲向東北歐地區傳播基督教義，本非新奇事務，實為歐洲全域逐步進入全面基督教化的必然結果，因傳教佈道大業本屬耶穌基督及教會導師對其信徒所傳承久遠的訓喻：將福音帶給異教徒，使之領受天主的寵愛賜福。然而此種訓喻在早期教會傳教士採行和平傳教的方式中，顯非單憑羅馬教會自身之力足以勝任，實須仰賴強大世俗統治者之助，其事方有底成之望。自西羅馬帝國在五世紀下半葉瓦解之後，曾經一度倚附東羅馬帝國及其後質變而來的拜占庭帝國為後盾的羅馬教會，至八世紀後期才在西方的法蘭克王國（Frankenreich/Frankish Kingdom）尋得有力的世俗君主的大力支持，從而使其傳教使命成為世俗君主向外擴張時所高舉的正當性藉口，卡爾／查理大帝／查理曼（Karl der Große/Charles the Great/Charlemagne, 747-，王 768-，帝 800-814）統治之期，正是將其對帝國東疆外緣地區的領土野心與羅馬教會的傳教行動合而為一，大舉向今德境北部的薩克森（Sachsen）及東南方的拜恩／巴伐利亞（Bayern），以及中歐的潘諾尼亞（Pannonia）平原，進行大規

和平移入模式，而是以十字軍的形式，亦即軍事征伐為前導而和平移民隨其後的武力拓殖形式而出現，大批波羅的海異教徒在遭到殘殺壓制而臣服之後，大批源自德意志西部的人民隨即應易北河以東的德意志領主強藩及德意志騎士團的招募，移往今德境東疆及波羅的海地區進行疆域開發與拓殖，使得易北河以東至普魯士之地自此之後逐步被同化成為德意志世界之一部。自十九世紀初以來隨著全歐民族主義浪潮的高漲，這段德人以武力拓殖於東北歐異教徒地區的中世紀史實，先後被德意志及斯拉夫，乃至於法英美學界，分別歌頌為拓殖開發歐陸東部與作為文明傳播者的英勇德人典範，以及醜詆為惡魔般的千年德人東侵惡行，亦即雙方皆將之高度民族主義及政治工具化，並將之視為中古德人東向移民拓殖史的唯一代表，至於絕大部分以和平面貌而東移中東歐其他地區的發展歷程，則幾乎全遭忽略，亦使得此一中古史實始終在民族激情下難以獲得客觀且全面深入的探索與檢視。歷經一、二戰的德國兩度揮軍東侵所造成的生靈塗炭後，在二戰甫結束的全歐炙熱仇德情緒下，更使得各方欲針對該史實在歐洲史的定位而進行持平客觀的探討，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直到 1972 年冷戰後期，在當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的「新東向政策」（Neue Ostpolitik）的推動下，與蘇聯及其所控制的「東方集團」各國達成了諒解之後，這段中世紀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史才得以首度擺脫民族主義因素的牽累，並獲致各國學界較為中肯持平的評論。依照歐洲各國史學界自該年後所建立的初步共識觀之，中古德人東移拓殖史被視為是一項跨世紀的移民拓殖行動，其性質與同期及稍後的伊比利半島之基督教諸國的「收復失土運動」（Reconquista）、諾曼人政權在亞平寧半島南部及西西里島的建立，以及十字軍在東地中海地區的擴張活動大抵相同，皆隸屬於中世紀歐洲全面性疆域開發及拓殖行動之一環。有關中古時期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史的歷程，以及該史實在十九及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及民族主義化的發展經過，請參閱如后兩專文的說明：杜子信，〈近代德波敵對下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史的政治工具化〉，頁 136-139；杜子信，〈中古時期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史作為德意志第二帝國東向擴張的宣傳工具〉，《興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2018），頁 1-34。

模的征服及信仰戰爭。於是自此之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之中，異教徒戰爭所代表的意涵，常指涉著領土征服及強迫皈依兩者合一。²⁵

法蘭克王國三分之後，位於原王國東部的東法蘭克王國（Ostfränkisches Königreich）暨其後由其轉變而成的德意志王國（Deutsches Königreich），在略定馬札爾之患並迫其皈依基督教之後，漸將其目光轉向當時德境東疆以外之地域。時至十世紀中期，德意志王國暨第一帝國（神聖羅馬帝國）²⁶「薩克森王朝」（Dynastie Sachsen, 919-1024）君主鄂圖一世（即鄂圖大帝，Otto I., der Große, 912-，王 936-，帝 962-973），採行與先前卡爾大帝相同之策，將其政治暨領土擴張野心繫之於神聖傳教大業之下，對易北河以東的今德意志東疆的西斯拉夫部族溫德人（Wenden/Wends），進行領土擴張及武力傳教行動。然則鄂圖大帝一度短暫達成的易北河與奧德河之間地帶的基督教化大業，在其歿後功敗垂成。溫德諸部族在利用薩克森王朝鄂圖一世甫逝未久、其子鄂圖二世（Otto II, 955-，王 973-983）兵敗義大利的政局不穩之際大舉起事，從而盡逐易北河以東的德意志官員及傳教士，於是從 983 至 1147 年之間，易北河與奧德河間的大部分領域重回異教徒世界。²⁷

²⁵ 此處必須說明的是，中古初期：八世紀下半葉卡爾大帝對日後德境的異教徒薩克森及拜恩人，以及對潘諾尼亞的阿瓦爾汗國的血腥征服戰爭，與中古高峰期：十一世紀後期的以上帝為名的異教徒戰爭，兩者之間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中古初期的異教徒戰爭，戰爭係由強大的世俗君主、而非由羅馬教宗所發動，此一時期，羅馬教會對採用戰爭暴力手段來逼迫異教徒皈依，仍持保留態度。然而時至中古高峰期，一如內文第貳部分所析論的，基於宗教熱情的爆發，羅馬教會一轉而成為異教徒戰爭的發起者，此際世俗君主的角色則轉為應教宗之所喚而組建十字軍，前往各邊陲地帶進行異教徒戰爭。詳請參閱 Johannes Fried, *Das Mittelalter : Geschichte und Kultur*, pp.178-181.

²⁶ 此一帝國為「薩克森王朝」鄂圖一世正式肇建於 962 年，最初的正式國號為「羅馬帝國」（Romanum Imperium），時至 1157 年「霍恩史陶芬王朝」（Dynastie Hohenstaufen, 1138-1254）的「紅鬍子」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2-，王 1152-，帝 1155-1190）在位之時，將國名改為「神聖帝國」（Sacrum Imperium），至 1254 年史陶芬王朝結束後的「王朝過渡/大虛位」（Interregnum, 1254-1273）期間，國名再次更動為「神聖羅馬帝國」（Sacrum Romanum Imperium），直到 1486 年「哈布斯堡王朝」（Dynastie Habsburg）的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 1415-，王 1440-，帝 1452-1493）在位之際，因帝國領域縮小僅侷限於德意志，遂又再次更名為「德意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Sacrum Roman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最後則在 1512 年帝國議會在科倫召開之時被正式標記於帝國官方文獻之中。由於此一帝國的名稱在歷史發展上不斷更易變動，在援引之際常因時空變化而不勝其擾，因而本文直接採用德意志第一帝國之名，如此用法較符合德文史著上以「德意志人之國度」（Das Deutsche Reich）之名來涵蓋千餘年德意志人在其領域上的發展，凸顯德意志歷史發展上的一致性，亦較符合許多國內外的史著上以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及第三帝國來分別稱呼 962 至 1806、1871 至 1918 及 1933 至 1945 年的德意志人國家的用法。有關德意志人國家的正式名稱的演變歷程，請參閱 Guido Knopp, Stefan Brauburger and Peter Arens, *Die Deutschen: Vom Mittelalter bis zu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Verlag C. Bertelsmann, 2008), p. 101.

²⁷ Werner Conze, *Ostmitteleuropa: Von der Spätantike bis zu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2), p. 18.

然則東北歐進入基督教信仰的世界，實屬大勢之所趨，若詳觀十世紀後期全歐宗教信仰的分佈範圍，尤可清楚窺見出，除了群集於伊比利半島中南端及亞平寧半島南部暨西西里島的穆斯林之外，從易北河以東沿著波羅的海南岸，一直向東北延伸至濱臨芬蘭灣的東波羅的海地區為止，為全歐碩果僅存的異教徒地區，其餘地區若非納入西方教會陣營，即屬東方教會版圖（見圖一），因而西方與東方教會皆試圖將之納入己方教會勢力範圍之中。²⁸



【圖一】1100 年基督教在歐洲的傳播與擴張

資料來源：原圖參照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36 而來，由作者自行繪製簡化並翻譯而成。

隨著十一世紀下半葉中古高峰期基督教世界的蓬勃旺盛動力的向外傾瀉，除了對穆斯林的聖戰始終是基督徒關注焦點之外，東北歐的異教徒地區亦因基督徒與異教徒在邊界地帶敵對態勢的陡增，從而再次喚起了處於德境邊界地帶的強大領土諸侯對易北河以東的領土野心，以及羅馬教會欲對該區進行基督教化的雄心，致有溫德十字軍東進易北河以東的征服異教徒溫德人的行動。該十字軍的興起，除先前所分析的中古高峰期歐洲各領域的蓬勃爆發力之外，實亦與此一時期德意志政局的演變，及羅馬教會強令異教徒皈依的旺盛企圖心息息相關。

由於在 1075 至 1125 年之間，德意志第一帝國「薩利爾王朝」（*Dynastie Salier*, 1024-1125）自亨利希四世（*Heinrich IV.* 1050-?, 王 1056-?, 帝 1084-1106）以降諸皇，因神職人員敘任權的問題而深陷與羅馬教宗的長期政教鬥爭之中，是為「神職敘任權之爭」（*Investiturstreit/Investitur Controversy*）。在這段長達五十年之期，德

²⁸ Jerzy Kłoczowski, "Die Konsolidierung der neuen Christheit im 13. Jahrhundert," in André Vauchez, ed., *Machtfülle des Papsttums 1054-1270* (Freiburg: Herder Verlag, 1994), p. 699.

意志境內各新興強大的領主諸侯趁著皇帝正與教宗進行殊死鬥、無暇顧及德境事務的千載難逢之機，紛紛強奪吞併週遭鄰近小型封建地主而大舉厚實自身勢力，從而建立起勢力強大的一方之霸的地位，其實力之強大漸不復為德皇室中央之所可制，德意志境內的封建社會於焉形成。這類實力強大的封建強藩，仍尋機進一步擴大自身版圖，俾恆久與德皇室中央及其他封建強藩相抗衡，於是在德意志境內各諸侯勢力範圍大致底定之餘，橫越易北河以東而強奪並征服西斯拉夫溫德人的領域，就成為擴大自身領域的最快捷方式。²⁹

德意志封建領主對易北河以東之地的政治野心，與其時基督教會向異教徒世界的炙熱傳教使命感遙相呼應，遂使兩者行動匯流一體而踰河東進。申論其實，自從983年西斯拉夫溫德人趁著德意志薩克森王朝勢衰而大舉起事、並將大批德意志官員及傳教士逐出易北河及奧德河之間之地以來，教會仍不斷派出零星傳教士數度東進易北河以東進行傳教大業。然而對西斯拉夫溫德人而言，始終堅決捍衛自身傳統多神教的信仰，嚴拒德人所宣稱之唯一真神的基督教，他們認定耶穌基督是德人的上帝，絕非是溫德人的真神。³⁰ 因此若皈依基督教不僅是對自身長久以來所認定且尊奉的真神「普里佩嘎」（Pripegal）的大不敬，連帶的必將大幅度地改變整個部族的社會結構，從而必將被迫臣服於異邦人士而為其所奴役。基於西斯拉夫溫德人根深柢固的信仰世界觀使然，使得早期教士的傳教事業全然以失敗收場。不過時至十一至十二世紀之交，隨著第一次十字軍運動中成功地收復聖城耶路撒冷之後，在狂熱的宗教情操驅使下，大幅強化了羅馬教會欲進一步強令毗鄰基督教世界邊緣地帶的異教徒或穆斯林，全部皈依基督信仰的堅定信念，於是再次東向易北河以東進行傳教大業，逐步被教會視為拓展羅馬教會版圖的不可或缺之一環。

進入十二世紀之後，由於德境薩克森各封建領主與溫德諸部族的邊界戰鬭不斷，導致易北河以西的沿邊羅馬教會各分支修道院不時橫遭洗劫，致令其認定，唯有儘快且全面性的將易北河及奧德河之間的西斯拉夫溫德人基督教化，方能使基督徒從異教徒的威脅中徹底解脫，從而確保基督信徒的永久安全。誠如馬格德堡大主教在1107至1108年間之所言：

²⁹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Orgins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pp. 259-260.

³⁰ Charles Higounet, *Die mittelalterliche deutsche Ostsiedlung*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Verlag, 1986), p. 63.

因為該地（指易北河以東之地）即吾人之耶路撒冷，此一聖地在初始之際本是自由自在而不受拘束之所，然而後來卻遭到異教徒殘酷的暴力下而受苦受難……。³¹

基督教世界迅速揚升的炙熱宗教情操及易北河邊界地帶的高度不穩定情勢，使得上述論點迅即在德境薩克森各諸侯及各分支教會機構中發酵，未幾就在羅馬教會發動第二次十字軍向巴勒斯坦進軍的號召之中，同時促發了溫德十字軍的軍事行動。

1147 年，在德皇召集下，德意志各大領主諸侯齊聚於法蘭克福帝國議會之中，大會主旨原在廣召德境內的領主諸侯參與教宗所呼籲的第二次十字軍運動，解救當時深陷不利軍事之局的巴勒斯坦十字軍諸國度，然而由於德意志東界形勢的危如累卵，使得薩克森各諸侯領主們拒絕參與前往聖地的第二次十字軍運動，轉而要求發動北方十字軍，橫越易北河以東，俾征服西斯拉夫溫德人並強令其接受基督教義，藉此一勞永逸地消弭薩克森東界的隱憂，進而將易北河以東之地併入薩克森各領主諸侯的版圖之中。³² 此一提議尤其在得到先前曾對第二次十字軍運動的成軍扮演著舉足輕重地位的聖者：清谷的聖·伯納德（St. Bernard de Clairvaux/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的讚許並為之聲嘶力竭的宣揚之下，迅速受到與會的帝國各世俗及教會諸侯的一致支持：

吾人毫不懷疑對那片領域（易北河以東之地）的所有權，以及對當地人民進行密集的傳教佈道行動，正如同上帝喚起了歷任（德意志）國王及諸侯們的堅定精神信念，從而對異教徒展開復仇行動一般，異教死敵終將在以基督為名的土地上盡遭剷除。……在得到包括國王、各大主教及諸侯在內的所有法蘭克福帝國會議與會者的共同決議之後，吾人宣佈，基督徒將以強者之姿，對抗那些高舉著偶像圖騰的異教徒，消滅其所有的族眾，或令其永遠皈依。³³

³¹ Friedrich Lotter, *Die Konzeption des Wendenkreuzzuges. Ideengeschichtliche, kirchenrechtliche und historisch-politische Voraussetzungen der Missionierung vom Elb- und Ostseeslawen um die Mitte 12. des Jahrhunderts* (Sigmaringen: Thorbecke, 1977), p. 60.

³² Burnam W. Reynolds, *The Prehistory of Crusades: Missionary War and the Baltic Crusades* (London: Bloomsbury, 2016), pp. 18-20.

³³ Bernhard von Clairvaux, *Sämtliche Werke*, lateinsich-deutsche Ausgabe, Band III, Gerhard B. Winkler, ed. (Innsbruck: Tyrola, 1992), p. 432.

羅馬教宗也就在聖·伯納德的強烈影響之下，旋於同年發佈聖諭，發動「溫德十字軍」行動，該行動將被視同如當時同時進行之中的十字軍南征與東征，參與者將被赦免其所有罪行，與之同時亦可在征服異教徒之後，得到最好的土地，儘管其上居住著邪惡的異教徒，但該地卻蘊藏著牛奶與蜂蜜、鮮肉與麵包的豐美。於是應教宗之所喚，北德、丹麥與波蘭各諸侯隨即組成了十字軍聯軍，大舉兵發易北河以東，行其軍事征服暨武力傳教之舉。³⁴

1147 年所組成的溫德十字軍，在當時德意志境內實力最強大的兩位封建領主：北部邊區伯爵「大熊」阿爾布雷希特（Albrecht der Bär, 1100-, 在位期間 1134-1170）及薩克森公爵「獅子」亨利希（Heinrich der Löwe, 1129/1131-, 在位期間 1139-1195）的統領之下，揮軍進入了易北河及奧德河間之地，對溫德諸部族採取大規模軍事攻擊。由於各自深懷政治野心，使得這項十字軍行動從初始之際即深陷各自為政、甚至於為了爭奪地盤而數度爆發同室操戈的情形，不過憑藉著十字軍數量上的極大優勢，仍對溫德諸部族造成沉重的打擊。最終西斯拉夫溫德諸部族在十字軍部隊的大肆鎮壓之下，被迫對德意志各領主諸侯稱臣納貢，其後並在傳教士及修道院修士的主持下，全面焚毀溫德人所有傳統神像及使全體部族成員受洗為基督徒。自此之後，該地就納入德意志各大封建強藩所屬的勢力範圍之中，其後在德意志傳教士傳教大業的快速進展，以及稍後未久大股源自德意志西部移民潮的湧入之下，易北河及奧德河間之地逐步且全面的進入基督教化及德意志化，漸次轉化成為德意志世界之一部，直迄今日。³⁵

溫德十字軍行動的成功及易北河及奧德河間之地的納入基督教版圖之中，對於當時的羅馬教會而言，無疑地是一場及時雨，係因新近甫在巴勒斯坦的第二次十字軍運動遭受重創之際，溫德十字軍在東北歐則成功地拓展基督教化大業，使得羅馬教會的聖戰之籲，多少得以因之而挽回若干顏面，下一階段的東北歐的傳教行動，也就在此一背景下而成為羅馬教會及基督教世界持續關注的大業。

³⁴ Burnam W. Reynolds, *The Prehistory of Crusades: Missionary War and the Baltic Crusades*, pp. 20-23.

³⁵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Orgins of Modern Germany*, pp. 263-266.

肆、德意志騎士團的興起及 其在普魯士與立夫尼亞的十字軍行動

前曾提及，中古初期羅馬教會對異教徒所進行的基督教化之舉，實係透過各大世俗君主的領土擴張行動之下而與之並行。時逢十世紀中後期德意志第一帝國薩克森王朝在鄂圖一世領軍下，數度揮軍東向而一度征服易北河及奧德河之間的西斯拉夫溫德人之際，約略稍後的 966 年，在奧德河及維斯瓦河流域的波蘭人在兼併諸部、皈依羅馬教會並建立起自身的波蘭國度之後，其第一個王朝：皮雅斯特王朝（Piastowie/Piast Dynasty, 966-1370），亦以上帝為名而向群集於維斯瓦河下游及波羅的海南岸的異教徒普魯深入，一支與立陶宛人及拉脫人有著相同血緣及語言淵源的波羅的海語系部族，³⁶展開軍事威逼及強迫皈依之舉。然而今波境北部的軍事征伐及武力傳教之舉，其結果一如早期在今德境易北河以東之地的情形雷同，最後皆以失敗而收場。

不過隨著十二世紀中期德意志封建領主諸侯的溫德十字軍行動的成功，德人重新征服易北河及奧德河間之地並迫令西斯拉夫溫德人皈依之後，波蘭人百餘年來對普魯深入的軍事征服及武力傳教行動，卻始終未能有所進展。尤有甚者，當皮雅斯特王朝從 1138 至 1320 年間陷入近兩百年的大分裂時期，普魯深入甚至利用波蘭皮雅斯特家族各世系陷入爭奪波蘭大公之位的大混戰之機，大舉反守為攻，從而數度深入了波蘭北方長期割據一方的皮雅斯特世系馬佐維亞公國（Księstwo Mazowieckie/Duchy of Mazovia）領域之中，致成馬佐維亞公國長期的邊防大患，³⁷最後馬佐維亞公爵康拉德一世（Konrad I Mazowiecki/Konrad I of Mazovia, 1187-，在位期間 1194-1247）在深陷波蘭內戰與外患入侵的雙重困境之餘，不得不在 1225 年時向甫成立不久的德意志騎士團求援。³⁸

³⁶ Charles Higounet, *Die mittelalterliche deutsche Ostsiedlung*, p. 222.

³⁷ Bernhart Jähnig,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p. 9.

³⁸ Benedykt Zientara, "Preußische Fragen in der Politik Heinrichs des Bärtigen von Schlesien," in Udo Arnold and Marian Biskup, eds., *Der Deutschordensstaat Preußen in der poln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Gegenwart* (Marburg: Elwert, 1982), pp. 86-112.

德意志騎士團（見圖二），或依拉丁文而譯為條頓騎士團（*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eutonicorum Ierosolimitano*），係中古高峰期十字軍運動狂潮下締建於巴勒斯坦的三大軍事修會之一。德意志騎士團與另兩支軍事修會：聖殿騎士團及醫院騎士團相同，皆恪遵中古高峰期所興起的修院組織所訂下的種種嚴格戒規，並與軍事征伐作結合，他們將修士的修道院苦修生活轉變為對穆斯林及其他異教徒的征戰攻伐，甚至不惜為之陣亡而尋得救贖之道：

一如其他的十字軍武士般，德意志騎士團創立的主要宗旨，實係透過犧牲自身生命而從中尋得救贖的。乍看之下，騎士團所選擇的方式似乎是奇特的，……實則德意志騎士團與修道院修士所使用的方式並無不同。兩者皆試圖在不脫離現實世界的前題之下，實現靈魂的救贖及聖潔。……德意志騎士團實採取非修道院苦修的方式，但其所為同樣是獻身於修道活動。³⁹

不過在聖城耶路撒冷陷落三年之後的 1190 年，才正式成立於巴勒斯坦濱海城市亞克（*Akkon/Acre*）的德意志騎士團，相較於另兩大軍事修會而言，在巴勒斯坦已幾無其可發展空間。隨著十二至十三世紀間基督徒在巴勒斯坦軍事行動上的漸次失利，德意志騎士團乃將重心逐步移往歐陸，歷經初期於匈牙利王國東疆七堡／外西凡尼亞（*Siebenbürgen/Transylvania*）嘗試建國的失利後，未幾旋應馬佐維亞公爵康拉德一世之請而移向波羅的海南濱及維斯瓦河下游地區，在第四任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查（*Hermann von Salza*, 1162-, 在位期間 1210-1239）的率領下（見圖三），於 1226 年進抵維斯瓦河下游的庫爾姆蘭（*Kulmerland*），正式開啓德意志騎士團經略普魯士及立夫尼亞之始。⁴⁰

³⁹ Eric Christiansen,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 (London: Macmillan, 1961), p. 85.

⁴⁰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in Theodor Hirsch, Max Toeppen and Ernst Strehlke, eds., *Scriptores rerum Prussicarum: Die Geschichtsquellen der Preussischen Vorzeit bis zum Untergange der Ordensherrschaft*, Band 1 (Leipzig: Verlag of S. Hirzel, 1861), pp. 36-37.



【圖二】德意志騎士團的武士穿著及裝備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於德國埃爾林恩（Ellingen）的「東普魯士文化中心文獻館」（Ostpreußen Kulturzentrum Ellingen）（拍攝日期：2009 年 10 月）



【圖三】德意志騎士團第四任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於波蘭馬爾堡（Malbork）（拍攝日期：2009 年 9 月）

德意志騎士團對普魯士及稍後對立夫尼亞所進行的異教徒戰爭，遠較先前溫德十字軍在易北河及奧德河間之地的征服及強迫皈依行動，更為血腥殘暴，主要係因至十三世紀初之時，異教徒波羅的海部族的普魯深人（Prussen/Pruzen/Old Prussians）及芬蘭——烏格里部族（Finno-Ugric）的立夫人與愛沙尼亞人之文明發展，仍屬初出草味的原始狀態，其所奉行許多原始社會的各類習俗，看在早已在基督教社會中接受各類文明禮儀洗禮下的騎士成員眼中，無異褻瀆冒犯上帝創世後所賦予人世的種種禮教，實屬萬惡不赦之舉，致而激發基督教十字軍騎士對異教徒的狂熱且血腥殘暴的信仰戰爭。⁴¹

先前在對易北河以東的西斯拉夫溫德諸部族的傳教大業中，儘管就精神及物質發展層面而言，溫德人毫無疑問地遠遠落後於來自德意志及西方的基督徒移民者，但兩者之間的文明落差並不致於導致基督徒完全無法理解及無法將溫德人同化的程度。因此十字軍在易北河以東的征服西斯拉夫溫德諸部族行動，儘管其間仍不時

⁴¹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pp. 21-24.

出現血腥暴力之景，然而普遍而言，只要溫德人宣佈臣服歸順並按期入貢，軍事征伐大抵即告終止，西多修院及普賴蒙特萊修院在德境的分支修會修士，隨即接手後續的溫德人集體皈依基督教的事宜。⁴² 然而波羅的海部族普魯深人則不然，時至十三世紀之初，仍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普魯深人社會在當時既無文字亦無紀日曆法，他們口操著一種鄰近德意志人與波蘭人皆無法理解的語言，並有著極為獨特的民風習俗，諸如一夫多妻、販賣婦女、搶婚及棄養嬰兒等等，這對已進入文明化社會的基督教世界成員而言，不可思議之餘，簡直視之為忤逆上帝的野蠻人行徑。⁴³

此外普魯深人參拜祭奉由木材所雕塑而成的各類神像的原始多神教信仰，看在德意志騎士團及修會傳教士眼中，直如對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於一體的世間唯一真神耶穌基督的極端蔑視。騎士團成員作為畢身為上帝及聖母效死不渝的戰士，自認為立於世間絕對及唯一真理之上，因而面對普魯深人所尊奉膜拜的各類面目猙獰的偶像，簡直將之視為撒旦邪靈的化身。在這種本能上出自基督教文明世界對原始宗教社會的強烈嫌惡及反感的態度下，德意志騎士團遂對波羅的海普魯深人採取毫不容情的鎮壓打擊手段，決心不計任何代價地欲消滅其惡風劣俗，迫其全面皈依基督教為止。⁴⁴

然而普魯深人從初始之際即非易與之輩，先前波蘭人歷時兩百餘年對普魯深人的軍事行動皆以失敗收場，即可看出普魯深人的軍事才能，然而正由於普魯深人對於基督徒強逼其皈依基督教而所進行的激烈抵抗，使得先前甫於巴勒斯坦與穆斯林作殊死鬥且戰果不彰的德意志騎士團，在初進普魯士而遭遇普魯深人的誓死抵抗之際，更激發其本能上對異教徒的極致痛惡，亟欲將先前在巴勒斯坦戰場受挫的悲愴憤慨，以一種渴望復仇的情結而盡行加諸於異教徒之身，旋即以極端的宗教狂熱及殘酷暴行而施加於普魯深人之上，於是普魯深人抗拒的愈加激烈，所引發後續騎士團的殺戮也就更為血腥殘暴。⁴⁵

⁴² Sebastian Haffner, *Preußen ohne Legende* (Hamburg: Wilhelm Goldmann, 1979), p. 19.

⁴³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 72.

⁴⁴ Bernhart Jähnig,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p. 293.

⁴⁵ Sebastian Haffner, *Preußen ohne Legende*, p. 19.

對普魯深入而言，德意志騎士團的入侵及迫其皈依基督教，實為一項極其恐怖的歷程，一如前言所提之佩劍兄弟騎士團對立夫尼亞的軍事征服及武力傳教的行徑般，身披重裝鎧甲的德意志騎士團成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而闖入普魯深入的各部落社會之中，並以普魯深入完全無法理解的語言而逼迫他們遵行其完全無法理解的事務，稍有異議或因不解而出現騷動者，則立時淪為騎士團的劍下亡魂。⁴⁶ 自從德意志騎士團在 1226 年進駐庫爾姆蘭後不久，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查隨即將一批又一批的騎士送往維斯瓦河沿岸各地，隨即以上述粗暴威嚇的手段而展開對普魯深入的軍事征服及武力傳教大業：

一項無與倫比的暴力緩緩從地面興起並直衝天際，騎士團兄弟們胸口滿懷上帝之德……。當吾人執劍在手，必令敵人心生恐懼……。在日落之前，所有騎士團兄弟皆揮去猶豫而執劍投身戰鬥，異教徒在飽受驚嚇而嘶喊奔逃之餘，騎士團兄弟則踏其鮮血而揮舞利劍前行。……也就在騎士團兄弟面對著這群雖無以計數、但僅擁少許兵械的異教徒的抵抗，一齣悲慘及愴痛之歌於焉響起。最後普魯深入終而拋棄其自數年以來即深陷悲愴悽慘的家園而逃往他處，然而若他們抱持著他們的子孫終究能在 4 代甚或是 6 代之後再遷回故居，則註定是前景無望的。他們期待其子孫能重返肥沃、寧靜及安逸的故土，但他們能見到的，將是一片在殘暴戰爭中所遺留下的破敗不堪及化為廢墟的荒原。⁴⁷

在騎士團毫不容情的暴力傳教及血腥屠戮之下，儘管歷經一波接一波的激烈抵抗，普魯深入仍漸難抵禦在軍事組織上享有高度優勢的德意志騎士團。自 1231 年騎士團大舉越過維斯瓦河以東、發動對普魯深入的征服戰爭開始，從維斯瓦河畔、波羅的海南濱，一直深入普魯士內陸，騎士團在逐步擊潰了普魯深各部族的頑強抵抗之後，一系列沿著維斯瓦河畔的城堡諸如投恩（Thorn）、庫爾姆（Kulm）、馬利亞威爾德（Marienwerder）及埃爾濱（Elbing）等被打造起來（見圖四及圖五），隨之吸引當時從德境西部大舉東移的德意志移民移入此類城市的週遭，漸漸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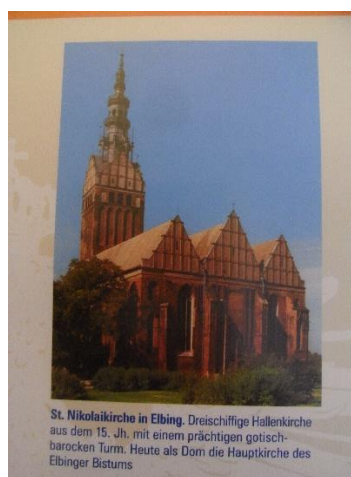
⁴⁶ Sebastian Haffner, *Preußen ohne Legende*, p. 19.

⁴⁷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Klaus Scholz and Dieter Wojteck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4), pp. 90-93.

堅實的城市據點。透過城堡鏈的緊密聯結及不斷外延，從而完成了由點、線至面的對所佔地域的全方位控制。⁴⁸



Marienwerder. Angelegt 1233 als erste Burg des Deutschen Ordens auf ostpreußischem Boden. Seit 1254 Sitz der pomersanischen Bischöfe; bis 1527 Sitz des Domkanonikats.



St. Nikolaikirche in Elbing. Dreischiffige Hallenkirche aus dem 15. Jh. mit einem prächtigen gotisch-barocken Turm. Heute als Dom die Hauptkirche des Elbinger Bistums.

【圖四】馬利亞威爾德的德意志騎士團城堡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於德國埃爾林恩（Ellingen）的「東普魯士文化中心文獻館」（Ostpreußen Kulturzentrum Ellingen）（拍攝日期：2009年10月）

【圖五】埃爾濱：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重要港都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於德國埃爾林恩（Ellingen）的「東普魯士文化中心文獻館」（Ostpreußen Kulturzentrum Ellingen）（拍攝日期：2009年10月）

德意志騎士團不惟積極征服普魯士，同時亦在先前另一波東北歐十字軍經略立夫尼亞而濱臨敗績之際，作為救援部隊而接手了立夫尼亞的武力傳教任務，因而也將其勢力正式伸向了東波羅的海地區，其事肇端於十三世紀初。最初由於斯時波羅的海全域的商業貿易活動日趨熱絡，西方教會頗欲藉機將時仍屬異教世界的立夫尼亞納入羅馬教會的勢力範圍之中，於是德境的布來梅大主教區，遂在 1200 年派出傳教士隨經商者而航向立夫尼亞，隨即組建了佩劍兄弟騎士團的武裝修會，對當地的立夫人、庫爾人、愛沙尼亞人及拉脫人展開軍事傳教之舉。佩劍兄弟騎士團在經過歷時達三十五載的鋒銳征戰而略定立夫尼亞之地後，旋將其兵鋒南指，欲趁勢征服立陶宛人，殊未料在 1236 年的「紹勒之役」（Schlacht bei Saule/Battle of Saule）中，慘遭毀滅性失敗。羅馬教會為挽救立夫尼亞的基督教化成果，羅馬教宗遂於次年下詔，佩劍兄弟騎士團暨其所轄之領地自是而後全部併入德意志騎士團麾下，至

⁴⁸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pp. 58-66.

此德意志騎士團乃承接佩劍兄弟騎士團在立夫尼亞的武力傳教大業。⁴⁹ 德意志騎士團甫一穩定立夫尼亞的局面之後，自然誘發其欲將咫尺相鄰的兩大地理區：普魯士及立夫尼亞聯成一氣的雄心。遂不斷從南北兩側展開向心式的攻擊，終在 1252 年間攻佔了美美爾（Memel）後，⁵⁰ 成功建立起一道聯結南北的狹窄陸橋，儘管該地始終處於立陶宛人的威脅之下而時失時得，難能長保穩定無虞（見圖六）。



【圖六】1226-1283 年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在普魯士及立夫尼亞的建立

資料來源：原圖參照 Hermann Kinder and Werner Hilgemann, ed., *dtv-Atlas zur Welt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and 1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4), p. 198 而來，由作者自行繪製簡化並翻譯而成。

底定立夫尼亞全域之後，其後的四十餘年間，騎士團竭其心力於普魯士深入的征服戰爭，惟普魯士各部族的抵抗仍極其激烈悲壯，其先後在 1242 至 1253 年，以及 1260 至 1274 年所掀起的兩度大起事之中，幾令德意志騎士團的征服成果喪失殆盡。⁵¹ 然隨後所激發的騎士團之報復行動，則極度血腥殘酷，在德意志騎士團及應其所喚的源自全歐各地的十字軍的助陣下，普魯士人的反抗遭致其全面的壓制而終以失敗收場。最後在 1283 年時，騎士團攻陷普魯士人在普魯士東北部的最後反抗據點之後，普魯士各部族被迫臣服於德意志騎士團的統治之下，並被強迫受洗為

⁴⁹ Hermann de Wartberge, "Chronicon Livoniae," in Theodor Hirsch, Max Toeppen and Ernst Strehlke, eds., *Scriptores rerum Prussicarum: Die Geschichtsquellen der Preussischen Vorzeit bis zum Untergange der Ordensherrschaft*, Band 2 (Leipzig: Verlag von S. Hirzel, 1863), pp. 33-34.

⁵⁰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Gsta PK), *Preussisches Urkundenbuch 1, 1 Hälfte: Die Bildung des Ordensstaats*, Nr. 261 (July, 29, 1252).

⁵¹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pp. 92-94, 129-132.

基督徒。⁵² 在完成對普魯士及立夫尼亞的征服後，騎士團旋在 1309 年將其總部由威尼斯遷至普魯士的馬利亞堡（Marienburg/Malbork）（見圖七），象徵其決心以兩地作為發展重心，此亦意調著稍後雄霸波羅的海地區百餘載之久的強權，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全面建構完成。⁵³



【圖七】馬利亞堡：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首都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於德國埃爾林恩（Ellingen）的「東普魯士文化中心文獻館」（Ostpreußen Kulturzentrum Ellingen）（拍攝日期：2009 年 10 月）

德意志騎士團在普魯士及立夫尼亞全境所進行的異教徒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全面的勝利，主因有三：其一在於當時普魯士人、立夫人、庫爾人、拉脫人及愛沙尼亞人的社會係處於諸部族分立的狀態，缺乏有效組織聯結之故而致遭騎士團個個擊破。與之相對的，享有優勢軍事組織及裝備齊整的德意志騎士團，儘管面對著戰志頑強卻內部呈現一盤散沙的普魯士人諸部族，終能將之逐一壓制並進而全面征服，更遑論部落分立更為鬆散的立夫尼亞地區各部族。⁵⁴ 當然騎士團在軍事上得勢的要因之一，某種程度上亦須歸功於拉丁世界各地十字軍的適時襄助騎士團，這對普魯士及立夫尼亞的全面征服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最後一項因子，實與德意志騎士團的東北歐異教徒戰爭在十三世紀後半葉時，逐漸發展成為整體十字軍運動的重心密不可分，對此實須就當時歐陸各邊陲地帶的其他十字軍運動的發展來作平行觀察，方能窺知其緣由。

⁵²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p. 33.

⁵³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p. 175.

⁵⁴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p. 94-95.

時至十三世紀中期左右，整體十字軍的戰果已然逐步陷於停滯、甚或不利之局，致使十字軍理想為之漸趨暗淡消沉。首先在巴勒斯坦部分，自從在 1189 至 1192 年間，由德法英三國國君率軍出征且聲勢浩大的第三次十字軍行動失敗之後，巴勒斯坦的殘餘十字軍國度僅侷限於東地中海濱的一小片狹長的濱海地帶而已，在週遭穆斯林的全方位威脅之下，其敗亡僅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原本在 1204 年所發動、旨在援助巴勒斯坦十字軍國度的第四次十字軍行動，卻在船東威尼斯共和國基於自身政治商業利益的考量下，蓄意將十字軍部隊引向攻打東方教會大本營的拜占庭帝國。雖在陰錯陽差之下，藉由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而達成將東方教會納入西方教會勢力範圍，從而完成基督教會統一的偉業，以及在巴爾幹地區建立起數個十字軍國度中而獲得了另類的成功。然而時至 1261 年之時，長期深陷內部傾軋且彼此互鬥不休的巴爾幹十字軍國度，終在尼西亞帝國的拜占庭復國勢力的持續交逼攻擊之下，步向全面的土崩瓦解之局。⁵⁵ 最後在伊比利半島上的收復失土運動方面，自從基督教諸國聯軍在 1212 年的「托洛沙之役」(Batalla de las Navas de Tolosa/Battle of Las Navas de Tolosa) 中，對穆斯林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之後，基督教諸國分頭南進，至十三世紀中葉之時，半島上勢力最大的兩強：阿拉貢王國(Kingdom of Aragon) 及卡斯提爾王國(Kingdom of Castile) 分別在 1248 及 1251 年攫取瓦倫西亞及直布羅陀角左近之地後，半島上的殘餘穆斯林勢力退守最後據點格蘭那達(Granada)，倚峙山川天險而負隅頑抗基督教徒的後續攻勢，此後雙方形成了一段長達近 250 年之久的對峙僵局，直迄 1492 年阿拉貢與卡斯提爾君合之後的西班牙王國攻陷格蘭那達為止。⁵⁶

於是就在十三世紀中期的整體歐洲十字軍運動，分處程度不等的停滯甚或衰退之際，德意志騎士團的東北歐十字軍行動，就成為了廣大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之中，

⁵⁵ 1204 年，十字軍在威尼斯共和國的協助下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之後，按照了當時歐洲封建等級社會的模式而在拜占庭的故土上先後建立了五個國度，其中最大者係掌控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Latin Empire)，另外則是作為其附庸的十字軍國度：薩羅尼卡王國(Kingdom of Thessalonica)、雅典公國(Duchy of Athens)、亞該亞侯國(Principality of Achaia)，以及由威尼斯人所建立的阿希佩拉戈公國(Duchy of the Archipelago)，至於掌控利凡特商貿優勢地位並坐擁強大海軍的威尼斯共和國，則為這些十字軍國度的主導力量。不過拜占庭帝國故土內仍有殘餘勢力伺機復國，其中最重要者乃立國於歐亞地峽對岸的尼西亞帝國(Empire of Nicaea)，該帝國利用了巴爾幹十字軍諸國度內鬥不休之機，並得到威尼斯共和國的商業競爭死敵——熱內亞共和國的全力幫助之下，終而在 1261 年擊滅了拉丁帝國，完成其復國大業。有關巴爾幹十字軍國度的興亡始末，請參閱 Johannes Fried, *Das Mittelalt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pp. 265-266.

⁵⁶ Johannes Fried, *Das Mittelalt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pp. 181-182.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p. 379.

唯一仍能將基督教化大業持續向前推進的強權勢力，此種背景下，教廷及各國騎士自然而然地將其關注目光逐步轉向東北歐的異教徒戰爭，此可由羅馬教會意圖將普魯士的基督教化成果歸之己有，以及各國十字軍的湧入普魯士清楚觀察出。

從德意志騎士團征伐普魯深人的最初階段中，教宗即試圖從騎士團進展順遂的軍事行動中，將東北歐的基督教化成果納為羅馬教廷所有。1234 年時，教宗突然頒佈詔令，宣佈庫爾姆蘭及未來德意志騎士團所攻佔的普魯士全域，皆屬「聖彼得的權利及所有」，應置之於教宗的保護之下，成為教廷的「永久領地」，⁵⁷並透過先前已設立的直屬教廷所掌控的普魯士主教區，從而計劃在德意志騎士團未來逐步征服普魯士的歷程中，同步在普魯士各地成立羅馬教會所屬教區，將教宗的影響力深入普魯士全域。⁵⁸羅馬教廷此舉顯然欲藉當時教宗統治權勢高漲之際，將當前及未來騎士團對普魯士的征服成果，置之於教宗的功績之下，從而以普魯士異教徒戰爭的成果，作為在教宗號召之下的十字軍運動依舊前景樂觀的明證，或多或少降低因巴勒斯坦及巴爾幹的諸十字軍國度步向衰敗下，所帶來的十字軍理想減損的不利觀感。

雖然就表面言之，羅馬教廷作為德意志騎士團的最高教會領主，騎士團理應尊奉教廷之令行事，然而實質上，甫自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查率領德意志騎士團進入庫爾姆蘭之際，即處心積慮地想建立起自身的統治領域，對於羅馬教會透過普魯士主教而諭令的各項要求，採行陽奉陰違之態，一切唯以自身政治利益為考量。⁵⁹因此在表面上，赫爾曼·馮·薩爾查對教宗將普魯士納為教會永久領地，並不公開抱持異議，反而藉此轉化為有利於己的態勢，趁著羅馬教會亟欲強化教宗統治制度及十字軍理想的野心，由教宗自 1232 年以降接二連三地號召十字軍參與征服普魯士的行動，藉此騎士團也就不斷地獲得援軍以為己助。⁶⁰此一背景下，大批源自德意志、波希米亞及波蘭各地君主及封建領主紛紛應教宗之喚而投入普魯士的異教徒戰爭之中，使得德意志騎士團對普魯深人的軍事行動更是如虎添翼。例如 125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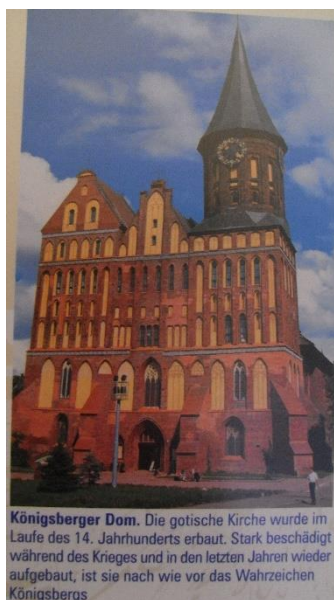
⁵⁷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GstA PK), *Preussisches Urkundenbuch 1, 1 Hälfte: Die Bildung des Ordensstaats*, Nr. 108 (August 3, 1234).

⁵⁸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p.9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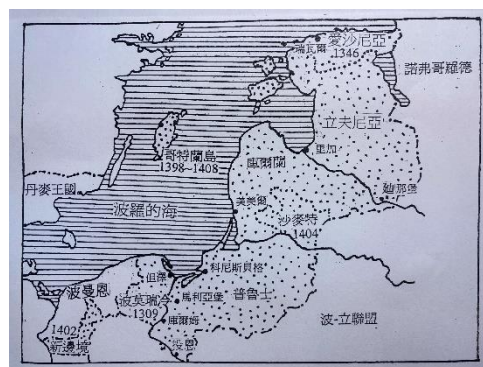
⁵⁹ Hans Hettler, *Preussen als Kreuzzugsregion : Untersuchungen zu Peter von Dusburgs Chronica terre Prussie in Zeit und Umfeld*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 2014), pp.540-541.

⁶⁰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GstA PK), *Preussisches Urkundenbuch 1, 1 Hälfte: Die Bildung des Ordensstaats*, Nr. 87 (Januar 23, 1232); Nr. 88 (Januar 28, 1232); Nr. 90 (Februar 17, 1232); Nr. 98 (Oktober 6, 1233); Nr. 100 (Oktober 7, 1233); Nr. 120 (1235); Nr. 121 (November 8, 1235).

時騎士團在其他各國十字軍部隊的襄助下所攻克的科尼斯貝格（Königsberg），意譯即「國王丘」（見圖八），這個後來長期成為東普魯士首府的城市，其得名即是來自於，表彰率軍攻下此一濱海山丘據點的波希米亞王國「普歇米索王朝」（ Přemyslid Dynasty, 929-1306）國王歐圖卡二世（Ottokar II, 1230-，王 1253-1278），不難觀出各國十字軍對騎士團國家的異教徒戰爭介入之深。⁶¹ 在騎士團國家、教廷及各國貴族騎士皆全力聚焦並投入之下，亦使該行動成為十三世紀後期全歐各地十字軍運動中唯一取得正面戰果者。



【圖八】科尼斯貝格：1466 年以後的東普魯士的首府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於德國埃爾林恩（Ellingen）的「東普魯士文化中心文獻館」（Ostpreußen Kulturzentrum Ellingen）（拍攝日期：2009 年 10 月）



【圖九】1405 年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最大疆域圖
資料來源：原圖參照 Manfred Scheuch, *Historischer Atlas Deutschland: Vom Franken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 (Augsburg: Verlagsgruppe Weltbild GmbH, 1997), p. 33 而來，由作者自行繪製簡化並翻譯而成。

當然也隨著德意志騎士團在全歐各地十字軍的襄助之下，使得對普魯深入戰事更趨於順利，騎士團大團長的統治地位自然愈見穩固，最後終在完成對普魯士全域

⁶¹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GstA PK), *Preussisches Urkundenbuch 1, 1 Hälfte: Die Bildung des Ordensstaats*, Nr. 319 (1255).

的征服之後，騎士團大團長形成了一個統轄著波羅的海東岸及南岸的廣大教會國度的統治者（見圖九），其地位實無異於強大世俗國度的國君，教廷安置於普魯士各地的大主教區及主教區等，根本難以對騎士團的決策產生實質的影響。⁶² 據此亦不難觀察出，從赫爾曼·馮·薩爾查以降的德意志騎士團歷任大團長，一再以投入為上帝及聖母而獻身的光榮戰役為名，同時亦在名義上遵奉教廷為最高領主，實則其深層目的不外乎藉此得到教宗號召各地十字軍的入境，襄助其完成對普魯士的征服大業。

伍、德意志騎士團的立陶宛戰爭及 十四世紀全歐貴族的立陶宛之旅

德意志騎士團甫在 1283 年全面征服普魯士人、並在東北歐的普魯士及立夫尼亞建立起強大的教會國度之後，隨即將其關注焦點轉向毗鄰其旁、係屬全歐最後一支異教徒、且對騎士團國家核心領域具有高度威脅的波羅的海語族立陶宛人。⁶³ 事實上，貫穿整個十四世紀的立陶宛戰爭，既是德意志騎士團的武力傳教與領土擴張戰爭，同時亦為中古高峰期全歐封建社會下各國騎士進行騎士作戰的絕佳練兵之所，與之同時更牽動了當時東北歐政局的脈動。

就德意志騎士團而言，十四世紀初所展開的立陶宛戰爭，同時兼具達成崇高信仰使命及成就波羅的海強權的兩大要素，前者無庸置疑地向為武裝修會及十字軍的理想之所繫，凡有崇拜偶像的異教徒所居之處，必然啟動其亟欲軍事傳教佈道之雄心，立陶宛人作為全歐最後一支異教徒身份自無可能例外；⁶⁴ 後者則涉及至打造強權國家的必要途徑，係因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所屬兩大核心領域：普魯士及立夫尼亞，係由波羅的海南岸向東北延伸至波羅的海東岸，兩地之間在初始之際並未打通，係因立陶宛人的分佈範圍正是處在兩地的聯結點上，致使騎士團無論如何都必須征服

⁶² Bernhart Jähnig,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pp. 13-14.

⁶³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pp. 146-149.

⁶⁴ Hanna Vollrath, "Deutsche Geschichte im Mittelalter," p. 97.

立陶宛人，此係成就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波羅的海霸權地位的必要條件，立陶宛戰爭也就在上述背景下而被開啓。⁶⁵

然而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立陶宛戰爭，從初始之際即陷入棘手困局，係因立陶宛人除了秉具與其血親部族普魯士人相同的卓越戰鬥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先前被騎士團所征服的普魯士人、立夫人、庫爾人及愛沙尼亞人等諸部族的社會，是處於部落林立且各自為政的狀態，各部族間難以組織有效的反擊武力，即使其間獲致少許勝果，亦未能久，終遭騎士團各個擊破而全面臣服於騎士團國家之下。反觀十三世紀末的立陶宛，就在騎士團全面征服普魯士未久，即時地在 1293 年完成了全境的統一，使得當騎士團國家欲徹底排除橫互於普魯士及立夫尼亞之間的障礙、進而逐鹿其波羅的海霸權之際，所面對的是一個新興強大且正在追求成就東歐霸主地位的立陶宛大公國。⁶⁶

從十三世紀末開始，立陶宛大公國趁著蒙古金帳汗國勢衰而對俄境統治鬆弛之際，全力東進及南進，歷時百餘年的鯨吞蠶食之後，至十四世紀末時，立陶宛大公國已將其疆域從東波羅的海地區一直向東推進至與莫斯科公國接壤，南則擴張至黑海海濱，版圖涵蓋了今立陶宛、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全域，從而成就其東歐霸主的地位。⁶⁷ 然則隨著版圖的巨幅擴展，尚處於異教世界的立陶宛大公國此際逐漸面臨到難以迴避的統治困境，即宗教抉擇問題。其因在於其所轄地域內涵蓋了大批基督徒臣民，尤以東正教徒佔絕對多數，因此立陶宛統治者為了統治權的順遂，逐步面臨到須皈依東正教的情境。然與此同時，面對來自西方新崛起的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打著十字軍的口號而不斷進逼立陶宛的西疆，使得立陶宛歷任大公最遲至十四世紀中期以後，即試圖與當時西鄰的另外兩大強權：身兼德意志第一帝國皇帝及波希米亞國王的盧森堡王朝（*Dynastie Luxemburg/Luxemburg Dynasty*, 1309-1438）與波蘭王國皮雅斯特王朝，締結共抗騎士團國家的軍事同盟，當然欲建構此種同盟，則皈依西方的羅馬教會實屬必要條件。據此，立陶宛君主別無選擇地勢必只能選擇皈依

⁶⁵ Desmond Seward, *The Monks of War – 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pp. 110-111.

⁶⁶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p. 151-152.

⁶⁷ Joachim Rogall,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Land der grossen Ströme von Polen nach Litauen*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6), p. 46.

基督教陣營，差別只在於究竟是皈依西方教會或是東方教會而已。⁶⁸ 然而此種抉擇的過程，在立陶宛內部因統治家族不同世系成員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來自東西方教會勢力不約而同地施加影響力，以及立陶宛境內舊有廣大異教勢力的排斥抗拒之下，使得立陶宛大公國的皈依基督教行動遲遲未能有所進展，於是時至十三世紀末期之前，立陶宛大公國明顯就採取著一種游移政策，亦即搖擺於東西教會世界之間，試圖尋求最終有利立陶宛利益的皈依時機點及歸屬陣營。⁶⁹

就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立場而言，立陶宛的皈依選擇則完全牽動到切身的利害問題，係因一旦立陶宛大公國皈依拉丁教會，頃刻間將使騎士團國家的十字軍行動完全失去正當性與合法性，騎士團不僅無法繼續以十字軍為名而征服並擴大普魯士與立夫尼亞間的聯結地：立陶宛屬地沙麥特／沙摩吉提亞（Samaiten/Samogitia），甚至將可能進而賦予立陶宛口實，要求騎士團開放邊界地帶，讓立陶宛軍隊深入騎士團國家所屬的普魯士內部，俾武力傳教於僅餘為數甚寡的殘存異教徒普魯士人，甚或要求騎士團與立陶宛合兵，共同征討立陶宛東南部的殘餘的異教徒，蒙古金帳汗國殘部。⁷⁰ 類此種種，恐令騎士團國家波羅的海的霸權之夢為之破滅，因此立陶宛大公國內部歷時數十載的宗教陣營抉擇之爭，對騎士團國家而言，在如釋重負之餘，無異提供其一項絕佳良機，藉之可一再發動以上帝為名的十字軍行動對抗立陶宛大公國，更實際的盤算則是以十字軍為名而成就其未來波羅的海霸權之路。⁷¹

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在十四世紀進程中所進行的立陶宛戰爭，雖與十三世紀對普魯士人的征服戰爭同屬異教徒戰爭，然而兩者間在本質上稍稍有異，此須由當時的國際情勢及社會文化的變遷來作觀察，始明其理。十四世紀初時，由於羅馬教廷在長期與法蘭西王室的政教鬥爭後落敗，樞機主教團被迫選出法蘭西籍教宗克雷蒙五世（Clément V. 1264-，教宗 1305-1314），在法王「俊美」菲利普四世（Philippe IV. le Bel, 1269-，王 1285-1314）的強力影響之下，教廷駐地在 1309 年時旋遷往法王國東南邊境地帶的一塊教廷所屬飛地：亞維農（Avignon），是為「巴比崙囚禁」

⁶⁸ Bernhart Jähnig,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pp. 73-74.

⁶⁹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p. 430.

⁷⁰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 155.

⁷¹ Odilo Engels, "Zur Historiographie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Band 48, 1966, p. 356.

（Babylonish Captivity），教宗統治權勢高漲的時代已成昨日黃花。⁷² 在羅馬教會威望大減的背景之下，儘管教宗仍試圖在此一世紀一再號召征討異教徒立陶宛的十字軍，然則此際騎士團國家的立陶宛戰爭及應其所喚而參與戰事的十字軍，以上帝為名的崇高的聖戰理想，雖仍一如既往般地形諸於眾十字軍之口，然而在實質上，信仰戰爭只是這場異教徒戰爭中多樣化動機的其中一環，實則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波羅的海霸權地位的全面建構，以及在全歐封建貴族騎士文化圈下，貴族世家聲望的提升及騎士戰鬥技能的磨練，並以作為全歐最後一片異教地區的立陶宛為其上演舞台，可能才是立陶宛戰爭中最為關鍵的兩大要因。前者無庸置疑，自十三世紀前期德意志騎士團進駐普魯士之初，即已是騎士團歷任大團長念茲在茲的終極目標；至於後者，則必須一探中古高峰期至晚期封建社會下，貴族騎士文化在十字軍運動的時代背景中的發展與演變，方能窺知其理。

時至中世紀高峰期的晚期之交，隨著十三世紀後半葉在伊比利半島上的「收復失土運動」陷入了近兩百五十年的停滯，以及 1291 年歐洲十字軍在巴勒斯坦的最後一個據點亞克為穆斯林所攻陷之後，全歐的十字軍運動頓時陷入了沉寂期，各國貴族武士騎士在失去了南征東征的舞台之後，貴族聲望的建立及騎士戰技的操練等騎士武藝禮儀文化突陷入難以為繼的態勢，亟須另覓可令其施展騎士武勇之風的場域，因此十四世紀初開展的立陶宛戰爭，毫無疑問地立刻匯集了各國貴族武士的目光，紛紛應騎士團及教宗之喚而前往普魯士，展開所謂「普魯士之旅」（Preussenreise）或「立陶宛之旅」（Litauenreise）。⁷³

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斷非以今日字面意義作解釋，而須以中古時期的語彙意涵理解之，該詞彙係意謂著，應教宗及德意志騎士團大團長之所喚而率軍前往普魯士，支援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對異教徒立陶宛人的戰爭。這項行動在十四世紀之時，是全歐貴族武士圈內一項眾所矚目的大事，若以現在的用語而言，就是上流社會的一項時尚活動。吾人深知，在中古時期一名基督平信徒生平之所願，係希望畢生至少要有一次前往聖城耶路撒冷，或是永恒之城羅馬，進行朝聖之行。與此相對的，對同一時期的封建貴族武士而言，這項朝聖之行的首要目的地，除了聖城耶路撒冷

⁷² Hanna Vollrath, "Deutsche Geschichte im Mittelalter," p. 109.

⁷³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 154.

之外，則為東北歐的普魯士及立陶宛，當時普遍流傳於貴族武士圈的一項不成文規範，就是一名真正秉忠誠、重榮譽、尚武勇、守紀律的貴族武士，生平至少應有一次前往普魯士參與對抗立陶宛人的戰爭，其間甚至不乏為了凸顯自身秉具所有完美騎士典範的虛榮心，而數度率軍遠赴立陶宛之行的貴族武士。⁷⁴

在十三世紀末期時，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正處於甫遭穆斯林全面逐離巴勒斯坦的挫敗陰影中，收復聖城耶路撒冷尚有待他日重整軍武之時，因而率軍前往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所在的普魯士而進行征討立陶宛人的戰爭，就成了進入十四世紀時全歐各地貴族武士們新興的朝聖大業。⁷⁵ 當時全歐各國各地區的貴族普遍視參與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為一項榮耀自身及家族的必要之舉，參與者莫不希望藉由此一參與攻擊異教徒立陶宛人的行動而揚名立萬，進而打響自身及家族在各國、甚至是全歐的知名度，從而躋身上流貴族社會之列，甚而更進一步贏得其在各國各地區中的實質政治影響力。⁷⁶

與之同時，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尤其被許多貴族武士視為維繫中古騎士文化之風的必要歷程，騎士文化中的許多禮儀諸如養成教育、授甲儀式及晉封騎士等等，在當時常常被移到普魯士的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境內而執行，其試煉場域就是在對戰異教徒立陶宛人的過程而完成。⁷⁷ 由於歐陸、尤其是中北歐各國的貴族武士們皆視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為個人及家族飛黃騰達的絕佳的途徑，⁷⁸ 因而不惜花費鉅額重金，購置各項軍事裝備行囊，帶領著大批隨行的麾下及奴僕，朝向普魯士而行，渴望從獵殺異教徒立陶宛人的過程中而建立其不朽之功名。⁷⁹ 由貴族圈中所流傳下

⁷⁴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 158.

⁷⁵ Udo Arnold, "Eight Hundred Years of The Teutonic Order," in Malcolm Barber, ed., *The Military Orders—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London: Variorum, 1994), p. 226.

⁷⁶ Bernhart Jähnig,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pp. 88-89.

⁷⁷ Hermann de Wartberge, "Beilage V zu Hermann de Wartberge Chronicon Livoniae: Aus Peter Suchenwirt, Heinrich dem Teichner und anderen deutschen Dichtern," in Theodor Hirsch, Max Toeppen and Ernst Strehlke, eds., *Scriptores rerum Preussicarum: Die Geschichtsquellen der Preussischen Vorzeit bis zum Untergange der Ordensherrschaft*, Band 2 (Leipzig: Verlag of S. Hirzel, 1863), pp. 155.

⁷⁸ Bernhart Jähnig,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pp. 226-227.

⁷⁹ Dick Edward Herman de Boer, "Niederländer im Ostseeraum und der Deutsche Orden: Hatte vondel doch recht? Ein Versuch zur Erklärung der historischen Rätsel hinsichtlich der Gründung der Stadt 'Holland' in Ostpreußen im Jahre 1297", in Dick Edward Herman de Boer, Gudrun Gleba and Rudolf Holbach, eds., *Wanderung von Personen, Verbreitung von Ideen, Austausch von Waren in den Niederländischen und Deutschen Küstenregionen*

來的大量吟遊詩歌及騎士「戀歌」(Minnesang)中，足以見證出當時全歐貴族武士對參與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的熱烈：

朝向普魯士、立陶宛、韃靼、土耳其，直抵大海。……以吾人之金銀購置吾人之甲冑，吟唱著戀歌而前行。⁸⁰

在這場前往普魯士的騎士團國家參與對立陶宛人的信仰戰爭的過程中，尤可看出歐洲各國貴族對於高尚優越的騎士精神與文化的呈現，在其心中所扮演的至高無上的角色：

看吾人策馬奔馳／身後追隨著五十個侍從／不惜花費鉅資／隨即展開普魯士之行／看眾人驅馬快行／其他五十名伯爵自豪與自傲／他們不吝於侍從之眾與耗資之鉅／透過對上帝之愛／透過騎士風範／他們秉具仁慈謙沖與高尚美德。⁸¹

吾人且可由這些參與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的眾多名門世家及貴族武士之中，觀察到他們藉由參軍行動而納入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政治決策圈中，從中不僅將其騎士文化發揮至淋漓盡致之境，甚至學習到諸多政治手腕及組織駕馭之技巧，其後對於歐洲若干國家的政局產生了實質的影響，其中尤以波希米亞國王「瞎眼」約翰(Johann von Luxemburg, 1296-?, 王 1311-1346) 與其子卡爾，即日後的德皇兼波希米亞國王卡爾四世(Karl IV, 1316-?, 王 1346-?, 帝 1355-1378)，以及英格蘭波林布洛克伯爵亨利(Henry Bolingbroke)，日後的英王亨利四世(Henry IV, 1367-?, 王 1399-1413)，為其中佼佼者。

以今日眼光觀之，波希米亞國王「瞎眼」約翰絕非一名受尊崇的統治者，係因約翰畢生始終領軍在外征戰，對於國內事務幾乎全然拋諸腦後，致使盧森堡王朝在波希米亞王國的統治根基難以穩固，因此在其逝世後及其子卡爾四世初掌波希米亞政權之初，幾經奮鬥之後，才能艱辛地將其盧森堡王朝的領土暨財產所有權牢握在手。然而若以十四世紀封建貴族武士圈的觀點而視之，則約翰全然是以正面形象而呈

von 13 bis 18. Jahrhundert (Oldenburg: Oldenburger Schrift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001), pp. 231-234.

⁸⁰ Karin Kranich-Hofbauer, Ute Monika Schwob, Brigitte Spreitzer, *Die Lebenszeugnisse Oswalds von Wolkenstein* (Wien: Böhlau, 1999), p. 49.

⁸¹ Hermann de Wartberge, "Beilage V zu Hermann de Wartberge Chronicon Livoniae: Aus Peter Suchenwirt, Heinrich dem Teichner und anderen deutschen Dichtern," pp. 161-162.

現，他毫無疑問地是集所有完美騎士典範於一身的君主，其畢身所念茲在茲者，唯欲展現其高貴騎士的過人英勇風範。約翰曾先後三次率軍參與立陶宛之旅，其中 1344 至 1345 年的最後一次參戰中，並命其子卡爾隨行征戰，亟欲全力擴大盧森堡王朝在德意志暨全歐政局的影響力，其外號「瞎眼」即係得名於與立陶宛人激戰後的雙眼受創失明而來。⁸² 因而約翰可謂是中古歐洲騎士文化在緩步步向黃昏前，力展騎士精神於落日餘暉最後光茫的傳奇人物。儘管「瞎眼」約翰在立陶宛戰爭中，終究因為戰局的難以突破而未能為其個人及盧森堡王朝贏得盛大威名，然他終能以其勇武之風而贏得當時貴族武士圈的高度敬重與頌讚，視其為完美騎士的不二人選。此一勇冠絕倫的騎士風采之姿，直迄其在翌年，即 1346 年的英法百年戰爭第一階段的克雷西戰役（**Battle of Crécy**）中，在英軍長弓手的飛煌箭雨中陣亡為止。⁸³

應德意志騎士團之邀而參與立陶宛之旅的歐洲各國貴族中，在其執行主要任務，即對異教徒的戰爭之餘，亦有若干才幹出眾者能藉此在騎士團國家的高層決策圈中，習得許多寶貴的執政行政技巧，從而在日後展其政治雄心於各國政壇，此尤以英格蘭王國的波林布洛克伯爵亨利為其中代表人物。亨利在 1387 年時，因參與密謀推翻其堂兄英王理查二世之事件，事敗被捕之後，理查二世以明升暗降方式將之流放至遠離京城倫敦之地。為了重新建立起自身基業，亨利遂在 1390 及 1392 年兩度領軍前往普魯士的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展開立陶宛之旅。這兩次與騎士團的軍事偕同作戰，同樣也未能在征服立陶宛人的軍事行動中成就任何決定性戰果。雖則如此，亨利卻有意外收穫，係因其在與騎士團國家高層討論作戰方式及軍事部署時，見識並學習到許多政治技巧及組織擊劃的手腕，使其在回到英格蘭之後，將之投入與理查二世的政治鬥爭之上，最後則成功地於 1399 年時罷黜理查二世，登上英格蘭國王之位，是為英格蘭「蘭開斯特王朝」（**Lancaster Dynasty, 1399-1471**）第一君亨利四世。⁸⁴

儘管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對異教徒立陶宛人的戰爭中，有著來自全歐各地大批貴族武士的助陣，然則對於戰事的進展卻無太大的助益，騎士團國家先後在 1344 至 1345 及 1377 年兩度對立陶宛人所發動的大規模軍事攻擊行動，盡皆以失利收場。

⁸² Desmond Seward, *The Monks of War – 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p. 112.

⁸³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 159.

⁸⁴ Werner Paravicini, *Die Preussenreisen des europäischen Adels* (Sigmaringen: Thorbecke, 1989), p. 149.

雖在其間若干小型軍事行動中，偶有少許進展，實則其成果與投入軍力完全不成正比。⁸⁵ 緊隨其後，由於東北歐國際政局的變化，使得騎士團國家的十字軍行動愈發難以維繫，係因作為全歐最後一支異教徒的立陶宛人，正式在十四世紀末期時皈依西方教會陣營，並與波蘭締結政軍同盟，其事頓令德意志騎士團國家陷入困境。

由於波蘭王國皮雅斯特王朝卡齊米日三世（大王）（Kazimierz III Wielki/Casimir III. the Great, 1310-?, 王 1333-1370）在 1370 年過世，因無男性繼承人，匈牙利王國的「安茹王朝」（Anjou Dynasty, 1308-1387）國王路易一世（大王）（I. Lajos magyar Király/Louis I. the Great, 1326-?, 王 1342-1382）遂以姻親之故而入主波蘭王位，隨即經過十餘年的統治後逝世，亦因無男嗣而使波王位空懸，經過一段短暫的紛擾之爭後，波蘭貴族決定藉由立陶宛大公雅捷弗與路易大王之女雅德維佳（Jadwiga Andegaweńska, 1373-?, 王 1384-1399）締婚、並受洗為基督徒，而正式迎立雅捷弗為波王，是為波蘭國王瓦迪斯瓦夫二世·雅捷弗（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 1352-?, 王 1386-1434），波蘭—立陶宛聯盟於焉締結，此即波蘭史上的「雅捷弗王朝」（Jagiellonowie/Jagiellonian Dynasty, 1386-1572）。⁸⁶

立陶宛大公國與波蘭王國之所以會在此際締建政軍同盟，主因就是為了要共同因應騎士團國家的不斷入侵有以致之。立陶宛固不待言，幾乎整個十四世紀，騎士團國家一再以上帝為名而對立陶宛發動異教徒戰爭，立陶宛大公早有皈依基督教陣營而令其師出無名之思，惟一如前述，基於境內大批東正教徒之故，使得立陶宛大公國在早期其實較為傾向東方教會陣營，其間立陶宛統治家族甚至曾一度幾乎欲藉由與莫斯科公國締婚而皈依東正教，進而建立立陶宛—莫斯科聯盟。然終因莫斯科公國距離立陶宛核心地域所在的波羅的海地區實在過於遙遠，對騎士團國家近在咫尺的窺伺覬覦，根本緩不濟急，再加上蒙古金帳汗國殘部對莫斯科公國的不時威脅，使得莫斯科深陷自身難保之境。其後在 1384 年的一次蒙古人襲擊莫斯科而令其受創甚重後，終令立陶宛大公國在評估兩方結盟價值大減之後，旋而轉向西方教會，未幾隨即與波蘭王國正式達成締盟協議。⁸⁷

⁸⁵ Charles Higounet, *Die mittelalterliche deutsche Ostsiedlung*, p. 219.

⁸⁶ Oskar Halecki, *Geschichte Polen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Heinrich Scheffler, 1963), pp. 61-65.

⁸⁷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p. 430.

至於就波蘭立場而言，與騎士團國家間的軍事鬥爭之局，同樣造成波蘭政局長期的困擾，由於先前波蘭皮雅斯特王朝大分裂時期北部的馬佐維亞公爵的引狼入室之失策，導致其後騎士團不僅全面征服普魯士，甚至越過維斯瓦河向西侵佔了大片波蘭西北部領域：波莫熱／波莫瑞冷（Pomorze/Pommerellen /Pommerelia）及格但斯克/但澤港（Gdańsk/Danzig），阻絕了波蘭通向波羅的海的通道，因而波蘭歷朝首要之務就是取回上述地區。⁸⁸ 惟波蘭力單勢孤，獨力對抗騎士團國家顯然力有未逮，因而尋機聯結外援實為上策，恰逢立陶宛亦長期蒙受騎士團國家入侵之苦，於是兩者一拍即合。1386 年時，兩國藉由王室締婚而締建波蘭－立陶宛聯盟（見圖十），立陶宛人正式皈依羅馬教會，至此德意志騎士團國家不僅頓失異教徒戰爭的號召，甚至面臨嚴峻的外在威脅。



【圖十】1386 年波蘭－立陶宛聯盟的建立

資料來源：原圖參照 Hermann Kinderun and Werner Hilgemann ed., *dtv-Atlas zur Welt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and 1, p. 200 而來，由作者自行繪製簡化並翻譯而成。

面對立陶宛人的皈依及與波蘭聯手，以及羅馬教會對之讚譽有加的嚴峻局面，騎士團國家在深陷困境之餘，為了能夠延續以上帝為名之下的進軍立陶宛征戰，遂嚴拒承認立陶宛人的皈依，並嚴詞批判波蘭人為邪惡的基督徒，⁸⁹於是兩方戰事遂以時戰

⁸⁸ Peter von Dusburg,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pp. 215-217.

⁸⁹ Wolfgang Wippermann, *Der Ordenstaat als Ideologie* (Berlin: Colloquium Verlag, 1979), pp. 58-59; Joachim

時歇的態勢而延續至十五世紀。然而實質上，時至十四世紀末期之時，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因內部矛盾對立愈形嚴重，致令其在對外方面日漸呈現力有未逮之勢。

由於騎士團國家自其國肇建以來，始終維持著寡頭統治的型態，決策制定及走向盡出自以大團長為首的一小群核心成員之手，然而在騎士團國家統治普魯士近兩百年以來，境內逐步發展出兩大「等級」（*Stände*）：土地貴族/容克階級（*Junker*）及市民階級（*Bürgertum*）。隨著兩大等級勢力在逐日發展而愈形壯大之後，漸有要求參與騎士團國家決策之心，然而基於自身利益考量，統治集團始終摒拒兩大等級參政之請，最後甚且尋求任何可行之方而全力打壓之。⁹⁰ 例如藉由將騎士團所屬地產廉價售予斯拉夫農民，致使土地貴族因底層農耕人口流失而導致收成大減；⁹¹ 另一方面，騎士團統治集團也藉由與漢薩組織建立密切的政商同盟關係，而介入獲利豐厚的波羅的海商貿，大力削弱市民階級的經濟根基。⁹² 類此種種打壓措施，導致兩大等級對騎士團統治階級強烈不滿。即令騎士團統治集團透過對兩大等級的強力打壓而牢繫政權於一時，殊未料經手波羅的海的豐厚商貿行動而逐日累積的鉅額財富，令騎士團國家高層難敵誘惑地日漸步向腐化之途，⁹³ 終令其早期苦行僧式之治國理念及剽悍絕倫之戰鬥力消失怠盡。於是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就在臣民離心離德及統治階級漸形腐化下，步向內外交逼的險惡危局。⁹⁴

面對內憂外患之局，騎士團大團長烏爾利希·馮·永金恩（*Ulrich von Jungingen*, 1360-大團長 1407-1410）舉步維艱之餘，決心孤注一擲，欲藉由發動一場對波蘭—立陶宛聯盟的戰爭而轉移內政困局，此舉正中波蘭—立陶宛聯盟下懷，遂有 1410 年的坦能貝格／古恩瓦爾德戰役（*Schlacht bei Tannenberg/Bitwa pod Grunwaldem/Battle of Grunwald/Tannenberg*）的爆發。殊未料在該役中，騎士團卻慘遭毀滅性失敗，自大團長以下幾乎全軍遭殲，德意志騎士團國家遂被迫於 1411 年

Rogall,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Land der grossen Ströme von Polen nach Litauen*, p.89.

⁹⁰ Karol Górski, "Die Anfänge der ständischen Vertretung der Ritterschaft im Ordensland Preußen im 15. Jahrhundert," in Udo Arnold and Marian Biskup, eds., *Der Deutschordensstaat in der polnischen Geschichteschreibung der Gegenwart* (Marburg: N. G. Elwert Verlag, 1982), pp. 225-229.

⁹¹ Francis L. Carsten, *Die Entstehung Preussen*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1968), p. 56.

⁹²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p. 199-200.

⁹³ Charles Higounet, *Die mittelalterliche deutsche Ostsiedlung*, p. 226.

⁹⁴ Sebastian Haffner, *Preußen ohne Legende*, p. 21.

與波蘭—立陶宛聯盟簽署「投恩和約」(Thorner Friede/Peace of Thorn)，償付巨額戰費後，換取波蘭—立陶宛聯盟的退兵。⁹⁵

坦能貝格之敗及投恩和約的簽署，係開啓了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結束之始，⁹⁶此後數十年間，騎士團國家陷入了內部等級不斷抗爭、起事及外部波蘭—立陶宛聯盟大力施壓的內外交逼之困局，⁹⁷在此一救亡圖存之期，騎士團國家統治階級首要關注者，僅在於如何維繫其自身統治權於不墜，至於以上帝為名而發動異教徒戰爭，僅是騎士團在近乎絕望之餘，用以號召歐洲各國騎士入境救援的最後一搏，實則在立陶宛人正式皈依之後，此一呼籲幾引不起太大回響，此亦代表著歷時近兩百年的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東北歐十字軍行動的正式落幕。

陸、結論

中世紀高峰期至晚期，西方羅馬教會以上帝為名，聲稱為了拯救異教徒的靈魂、使之領受天主恩寵而發動了十字軍，在各國貴族武士及各支軍事修會的襄助下，遂有歷時兩版餘年之久的全歐十字軍運動，紛紛在歐陸的邊陲地帶進行征討異教徒的戰爭，東北歐的十字軍運動在本質上亦隸屬於廣大的中古歐洲十字軍運動之一環。然而若進一步探究十字軍運動的內涵與歷程，實不難清楚窺見出，神聖的宗教使命：將福音帶給異教徒，幾乎皆僅是表象上的因子，實則參與十字軍行動的各方皆有其不同動機。以本文所探討的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東北歐十字軍行動為例，已然可由文中所論述剖析的波羅的海十字軍經略始末，歸結出十三及十四世紀的東北歐異教徒戰爭中參戰各方動機的鮮明差異性。

首先在十三世紀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所發動的第一波征服普魯深人的戰爭中，儘管初始之際，騎士團藉由教宗聖諭及所號召各地十字軍的襄助下，確實透過「火與劍」(mit Feuer und Schwert)的武力血腥的傳教手段而迫使大批異教徒普魯深入皈依，然則隨著對波羅的海南岸普魯士的控制愈趨穩固，以及合併佩劍兄弟騎士團後

⁹⁵ Hartmut Boockman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 Ostpreussen und Westpreussen*, pp. 203-205.

⁹⁶ Joachim Rogall,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Land der grossen Ströme von Polen nach Litauen*, p. 89.

⁹⁷ Hartmut Boockmann, *Wege ins Mittelalter*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0), pp. 113-114.

而將其領域進一步擴張至波羅的海東岸的立夫尼亞之後，德意志騎士團意圖建構其波羅的海霸權的雄心，已然勢不可擋。此際縱橫馳騁於歐陸北方的國際場域並試圖建構自身在東北歐的獨霸地位，迅速晉升為騎士團唯一關注事務。

於此同時，先前曾一再以上帝為名而強逼普魯深人全面皈依的聖戰大業，在此一進程中就逐漸降為次要事務，係因儘管其間普魯深人已全面臣服於騎士團國家之下，並強迫受洗皈依為基督教徒，然而實際上，在普魯士內部仍有為數不少的普魯深人私底下繼續供奉著各類異教神像，維繫其傳統的異教信仰於不墜。騎士團統治階級對此一現象其實了然於胸，但他們終究並未採行積極的作為，這當然並非意謂著德意志騎士團奉行宗教寬容政策，無寧說是騎士團所屬的各級兄弟會成員不足，傳教佈道機構難以全面深入廣大的普魯士各地，致而不得不對之採行輕忽放任的態度。⁹⁸ 因此相對於騎士團國家統治階級所關注的建構起波羅的海獨霸地位的野心而言，在內部的傳教大業上，只要普魯深人安於作為騎士團國家的臣民地位，不思反抗騎士團的統治，並定期繳納稅金，則騎士團統治階級亦無多餘心思及多餘人力去關切所屬臣民對基督教的虔誠與否。這亦是何以普魯深人的異教信仰能夠在普魯士全域進入全面基督教化的狀態下，仍有部分持續殘留下來的深層因素，普魯深人的異教傳統甚至終德意志騎士團統治普魯士之期都屹立不搖，直至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掀起的宗教改革浪潮的百餘年後的十七世紀中葉，此一異教傳統才完全消失於普魯士境內。⁹⁹

亦因騎士團所執行的政策，係以高舉基督教聖戰旗幟為號召，實則在於進行自身領域的擴張及強權國家的打造，亦即這場以上帝為名的戰爭，實是為了達成騎士團國家的政治強權雄心，而非僅在於建立起教會所衷心期盼的純淨教會國度，致使騎士團國家長期以來始終遭到羅馬教會毫不容情的批判。¹⁰⁰ 據此並不難窺見出所謂的異教徒戰爭，對掌控軍力的統治者與基督教會間想法上的明顯落差，此種想法上的落差同樣也可在下一個世紀的另一波異教徒戰爭充分觀察到。

在十四世紀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所進行的第二波異教徒戰爭，征討立陶宛人的戰爭中，騎士團國家的立場仍一如既往般，以全力打造並鞏固其波羅的海獨霸地位為

⁹⁸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p. 108-109.

⁹⁹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p. 81.

¹⁰⁰ Hartmut Boockmann,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p. 111.

其終極目標，唯一構成其目標的絆腳石，就是地理位置上深深契入普魯士及立夫尼亞之間的立陶宛大公國。因而為了徹底除卻立陶宛人的威脅，發動一場以上帝為名的異教徒戰爭，藉由當時全歐各地的貴族武士之助而展開一系列的立陶宛征服戰，逐步成就並進而建構出十四世紀後半期的波羅的海地區的獨霸態勢。

至於就西方羅馬教會而言，自從與法蘭西國王政教鬥爭落敗，樞機主教團被迫選出法籍教宗、並將駐地西遷至法邊界的亞維農之後，這段所謂「巴比崙囚禁」之期導致教宗威望跌入谷底，因而為了挽回羅馬教會的顏面，廣為號召十字軍運動而支援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東北歐異教徒戰爭，成為教宗的必要策略，儘管羅馬教會所屬各大主教區對於騎士團國家的宗教政策可說毫無置喙之地，然若就維繫表象上羅馬教會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精神領袖地位，此舉勢所必然。

至於就應教宗及騎士團國家之喚、而展開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的全歐各地貴族武士而言，則這場異教徒戰爭又代表了其他的意涵，維繫貴族騎士文化於不墜。係因自十三世紀中葉以後，陸續失去其他邊陲地帶的異教徒戰爭舞台後，騎士文化賴以維繫的騎士養成教育、戰技訓練、軍事冒險，甚至是武士騎士建立功勳及貴族世家彰顯自身不凡地位的管道，幾皆消逝無餘，於是此際唯一碩果僅存的異教徒戰爭場域，僅餘東北歐的波羅的海地區，是以全歐各名門世家及貴族武士莫不聚焦於此，紛紛展開普魯士或立陶宛之旅，征討立陶宛人，期能建立其不朽戰功而威震天下、名揚四海，從而一舉躋身上層貴族名流之列。

德意志騎士團國家也就藉由參與各方的不同動機，機靈地將自身政治雄心隱於其中，將之納入一場以上帝為名的波羅的海十字軍行動，終而在十四世紀後半期成就其波羅的海強權地位。然則立陶宛人作為其側翼之威脅，始未能除，卻也令騎士團國家得以在整個十四世紀之期，充分利用異教徒戰爭之名而行其領土擴張之實。直迄 1386 年，當立陶宛大公國正式皈依西方教會，並藉由與波蘭王國締婚而締結波蘭—立陶宛政軍同盟之後，頓令騎士團國家所發動的十字軍行動師出無名，騎士團蹙憤之餘，堅不承認立陶宛人的皈依，並視波蘭人為邪惡的基督徒，從而為其繼續揮軍立陶宛及波蘭尋求合理化的說辭，這種明顯有違羅馬教會的行徑，不啻清楚地說明了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東北歐十字軍運動的本質，宗教動機下所隱藏的政治野心方是其核心要旨。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一) 官方原始檔案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GstA PK), *Preussisches Urkundenbuch* 1, 1 Hälfte: *Die Bildung des Ordensstaats*.

Nr. 87 (Januar 23, 1232)

Nr. 88 (Januar 28, 1232)

Nr. 90 (Februar 17, 1232)

Nr. 98 (Oktober 6, 1233)

Nr. 100 (Oktober 7, 1233)

Nr. 108 (August 3, 1234)

Nr. 120 (1235)

Nr. 121 (November 8, 1235)

Nr. 261 (Juli, 29, 1252)

Nr. 319 (1255)

(二) 史料暨檔案彙編

Clairvaux, Bernhard von. *Sämtliche Werke*. lateinsich-deutsche Ausgabe. Band III. Gerhard B. Winkler ed. Innsbruck: Tyrola, 1992.

Dusburg, Peter von.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Klaus Scholz and Dieter Wojtecki tran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3.

Dusburg, Peter von.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 in Theodor Hirsch, Max Toeppen and Ernst Strehlke eds. *Scriptores rerum Preussicarum: Die Geschichtsquellen der Preussischen Vorzeit bis zum Untergange der Ordensherrschaft*. Band 1. Leipzig: Verlag von S. Hirzel, 1861.

Lettland, Heinrich von. *Chronicon Livoniae*. new translation of Albert Bau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59.

Wartberge, Hermann de. "Chronicon Livoniae." in Theodor Hirsch, Max Toeppen and Ernst Strehlke eds. *Scriptores rerum Preussicarum: Die Geschichtsquellen der Preussischen Vorzeit bis zum Untergange der Ordensherrschaft*, Band 2. Leipzig: Verlag of S. Hirzel, 1863.

二、專書

Bainton, Roland H.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A Historical Survey and Critical Re-evaluation*. New York: Abindon Press, 1979.

Barracrough, Geoffrey. *The Orgins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Bartlett, Robert. *Die Geburt Europas aus dem Geist der Gewalt*. München: Kindler, 1996.

- Beumann, Helmut. *Kreuzzuggedanke in der deutsche Ostpolitik des Mittelalter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3.
- Boockmann, Hartmut.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9.
- Boockmann, Hartmut. *Wege ins Mittelalter*.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0.
- Boockmann, Hartmut.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1.
- Carsten, Francis L. *Die Entstehung Preussen*.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1968.
- Christiansen, Eric.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 London: Macmillan, 1961.
- Conze, Werner. *Ostmitteleuropa: Von der Spätantike bis zu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2.
-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 Fried, Johannes. *Das Mittelalt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8.
- Haffner, Sebastian. *Preußen ohne Legende*. Hamburg: Wilhelm Goldmann, 1979.
- Halecki, Oskar. *Geschichte Polen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Heinrich Scheffler, 1963.
- Hettler, Hans. *Preussen als Kreuzzugsregion: Untersuchungen zu Peter von Dusburgs Chronica terre Prussie in Zeit und Umfeld*.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 2014.
- Higounet, Charles. *Die mittelalterlich deutsche Ostsiedlung*.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Verlag, 1986.
- Jähni, Bernhart.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landes und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Münster: Nicolaus-Copernicus-Verlag, 2011.
- Kinderun, Hermann and Werner Hilgemann ed. *dtv-Atlas zur Welt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and 1.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4.
- Knopp, Guido, Stefan Brauburger and Peter Arens. *Die Deutschen: Vom Mittelalter bis zu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Verlag C. Bertelsmann, 2008.
- Koch, Wilfried. *Kleine Stilkunde der Baukunst*. München: Orbis Verlag, 1991.
- Kranich-Hofbauer, Karin, Ute Monika Schwob and Brigitte Spreitzer. *Die Lebenszeugnisse Oswalds von Wolkenstein*. Wien: Böhlau, 1999.
- Lotter, Friedrich. *Die Konzeption des Wendenkreuzzuges. Ideengeschichtliche, kirchenrechtliche und historisch-politische Voraussetzungen der Missionierung vom Elb- und Ostseeslawen um die Mitte 12. des Jahreshunderts*. Sigmaringen: Thorbecke, 1977.
- Mallory, J. P.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 Mitterauer, Michael. *Warum Europa? Mittelalterliche Grundlagen eines Sonderwegs*. München: C. H. Beck, 2009.

- Paravincini, Werner. *Die Preussenreisen des europäischen Adels*. Sigmaringen: Thorbecke, 1989.
- Pistohkors, Gert von.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Baltische Länder*.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Verlag, 1994.
- Reynolds, Burnam W. *The Prehistory of Crusades: Missionary War and the Baltic Crusades*. London: Bloomsbury, 2016.
- Rogall, Joachim.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Land der grossen Ströme von Polen nach Litauen*.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6.
- Scheuch, Manfred. *Historischer Atlas Deutschland: Vom Franken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 Augsburg: Verlagsgruppe Weltbild GmbH, 1997.
- Seward, Desmond. *The Monks of War–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London: Archon Books, 1972.
- Stadtmüller, Georg. *Geschichte Südosteuropas*. München and Wi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76.

三、專書論文

- Arnold, Udo. “Eight Hundred Years of The Teutonic Order.” in Malcolm Barber ed. *The Military Orders–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London: Variorum 1994, pp. 223-235.
- Gresser, Georg. “Die Kreuzzugs-idee Papst Urbans II. im Spiegel der Synoden von Piacenza und Clermont.” in Peter Bruns and Georg Gresser eds. *Von Schisma zu den Kreuzzügen 1054-1204*.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5, pp. 133-154.
- Górski, Karol. “Die Anfänge der ständischen Vertretung der Ritterschaft im Ordensland Preußen im 15. Jahrhundert.” in Udo Arnold and Marian Biskup eds. *Der Deutschordensstaat in der poln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Gegenwart*. Marburg: N. G. Elwert Verlag, 1982, pp. 218-236.
- Kłoczowski, Jerzy. “Die Konsolidierung der neuen Christheit im 13. Jahrhundert.” in André Vauchez ed. *Machtfülle des Papsttums 1054-1270*. Freiburg: Herder Verlag, 1994, pp. 688-715.
- Seibt, Ferdinand. “Die Deutsche Siedlung im Osten: Träger bürgerlicher Lebensart in Schlesien, Böhmen und Südosteuropa.” in Hans-Ulrich Engel ed. *Deutsche unterwegs: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Ostsiedlung bis zur Vertreibung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Günter Olzog Verlag, 1983, pp. 41-73.
- Vollrath, Hanna. “Deutsche Geschichte im Mittelalter.” in Martin Vogt e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und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1990, pp. 1-143.
- Zientara, Benedykt. “Preußische Fragen in der Politik Heinrichs des Bärtigen von Schlesien.” in Udo Arnold und Marian Biskup ed. *Der Deutschordensstaat Preußen*

in der poln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Gegenwart. Marburg: Elwert, 1982, pp. 86-112.

四、期刊論文

Engels, Odilo. "Zur Historiographie des Deutschen Ordens im Mittelalter,"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Band 48, 1966, pp. 336-363.

杜子信，〈近代德波敵對下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史的政治工具化〉，《成大歷史學報》，第 56 號（2019），頁 133-199。

杜子信，〈中古時期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史作為德意志第二帝國東向擴張的宣傳工具〉，《成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2018），頁 1-34。

（責任編輯：李新元、張偉恩）